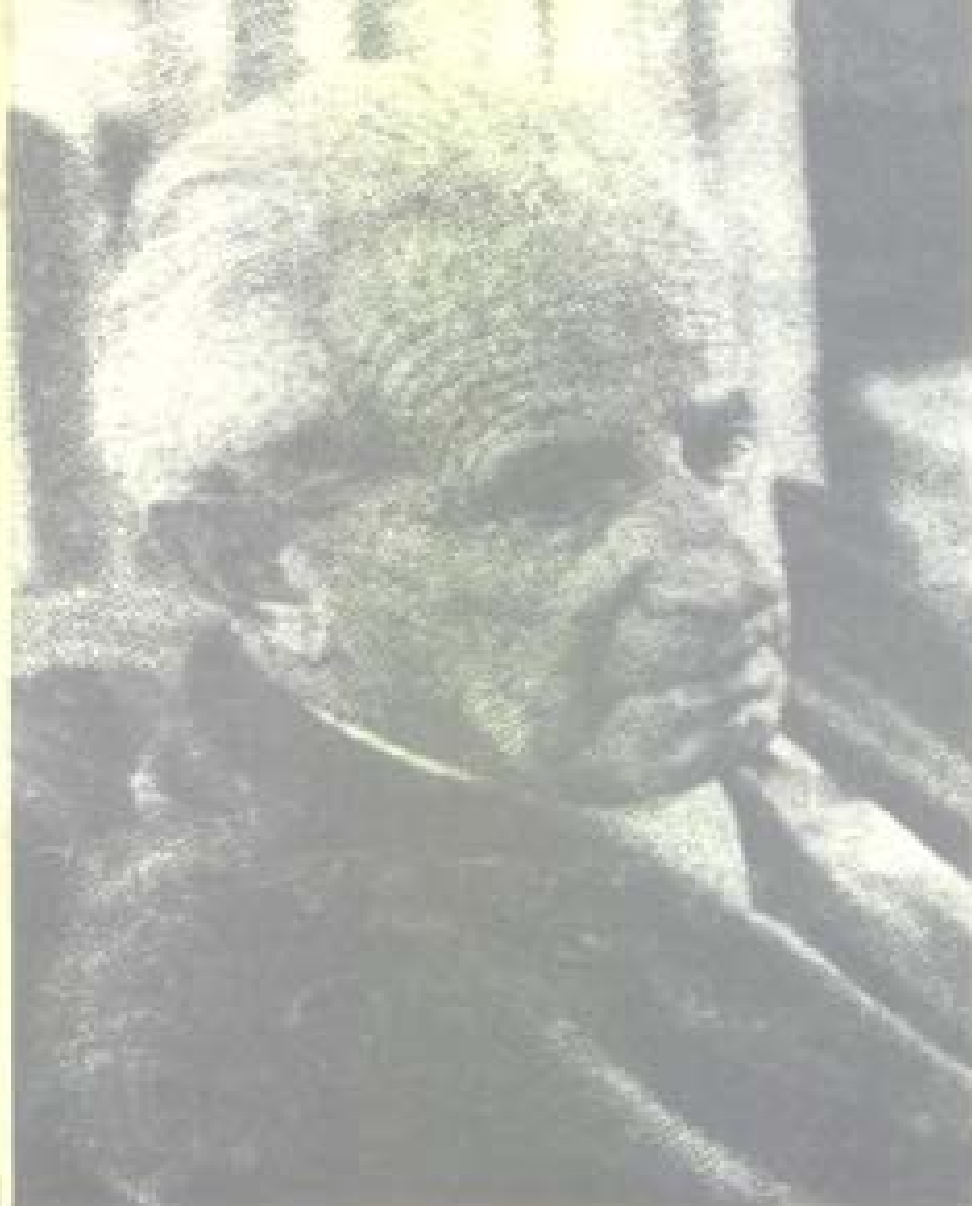


THE LIFE OF MARY MATHI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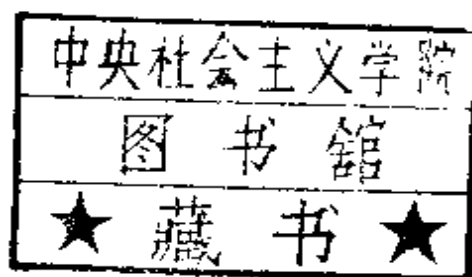
中央社会王入字五
图书馆
★藏书★

(美)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 著
邵一艇 译
余明 校

马尔库塞

[美]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 著

邵一诞 译
余 明 校



责任编辑：张晓明
责任校对：晓晨
封面设计：杨永德
版式设计：李勤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马尔库塞

〔美〕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著

邵一廷译
余明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36×965毫米 32开本 5印张 66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004·0499·9/B·98 定价：1.70元

编者献辞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出版了，我们编委会全体成员向尊敬的读者致意！你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但在这里，我们都站在崇高的人类文明的精神殿堂的门口处，我们都沐浴着几千年圣贤哲人的思想睿智之光。这套丛书所介绍的精神巨人的思想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整个世界，我们的时代和我们个人都深深受着他们创造性思想成果的影响。

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我们接受了一种极片面的看法，以为只要接受了文明的最新成果就足以创立未来的理想社会。其实，人类文明演化的每一阶段，人类精神发展的每一里程，以及每一独立形成的文明系统都有其不可替代的

价值，都会产生站在那个时代巅峰上的思想巨人。这些巨人的深邃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以及他们对于真理永无止境的追求，将与人类文明共存。正像马克思是不朽的一样，黑格尔和苏格拉底也是不朽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学术界几十年来在介绍和研究世界大思想家的精神遗产方面存在某些片面性，许多人物不仅他们的著作从无译本加以介绍，甚至连名字也被禁止提起。因此，编辑出版一套系统介绍世界上最重要的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的丛书，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其意义是毋需多说的。为了保证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水平，我们决定从外国享有盛誉的学术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世界著名思想家的研究和介绍性丛书中加以挑选，进行翻译。如无相应丛书，则选择其学术价值在世界上得到公认的权威著作作为译本。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仅能使读者概括地了解所介绍的人物的生平和思想，而且了解关于这些思想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在选择译本时，我们力求取材通俗，以便使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以下的读者不致望而却步。

我们都是刚刚开始从事理论工作的青年人，若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界前辈的指导，

没有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同志的鼎力协助，丛书不会这样顺利和迅速地问世，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谢意。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辑委员会

译者序

一位充满理想精神的社会批判家

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这位被欧美“新左派”运动奉为“先知”和“新左派思想守护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名字，在我国已不那么生疏了。至今欧美的一些30—40岁的中年人提起他的名字，对他在本世纪60年代源于法国、流行于欧美其他各国的青年学生造反运动中的巨大影响，仍然记忆犹新。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主要成员，他的思想已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对马尔库塞的思想评价众说纷云：有人认为：马尔库塞“把马克思主义修改到使许多人不再认为他们的著作可以同马克思主义相容的地步”；也有人认为马尔库塞是“发达工业社会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家”；

还有人认为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是影响最大的最新的假马克思主义流派”，是“不知不觉地鼓励了一种无头脑的破坏性的抗议的态度”。这本小书是这众多评论中的又一个“不谐和音”，并以它在这众多赞扬或批评的“合奏”中的独特“音调”而引人注目。

勇于批判和富有理想精神，这是马尔库塞的两个主要特点。

马尔库塞为哲学设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批判其他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从20年代他在德国弗莱堡大学的学生时代起，哲学与现实政治就在这位前社会民主党党员身上如同孪生姐妹一般密切相连。而对象瘟疫一般迅速蔓延的纳粹主义浪潮，他大声疾呼要捍卫“欧洲哲学理性的内核”，把纳粹时代的资产阶级极权主义视为非理性主义的表现。可以说他作为社会“判家”的“先知”地位在他从事哲学之初就已奠定了。他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马尔库塞采取了与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所持的批判态度不同的立场，把弗洛伊德理论与“批判”方法相结合，从人的性欲与“异化”来解释人类文明。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压抑了作为人本质的潜在创造能力，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中的人是异化的，因此，人们是按照异化的行为方式行事，而不是按人本来所具有的内在感情和能力活动。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文明在“性解放”问题上存在着“多余的压抑”，而“死本能”——这个弗洛伊德首创的意志无意识冲动的心理分析概念，则是解释现代战争的有效工具，并且，它在全人类所有破坏性行为中都起作用，这种批判方式是独具特色的，但也显然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利益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与文明的方法大相径庭。但是，其意在“批判”却是毋庸置疑的。

使马尔库塞从一个书斋式的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者转变为一个新左派运动“理论家”的契机，是《单向度的人》一书的出版。《大英百科全书》有关马尔库塞的条目中，也把他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称为其理论的“主要贡献”。马尔库塞悲哀地发现：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创造出了崭新的生活方式，满足了那些可能会反抗的人的需要，促进了人们与现存制度的同一。对这些现象他生动地描写道：“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和游览同一个娱乐场所；如果打字员打扮得象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有一辆卡德拉牌汽车，如果他们全都阅读同一份报纸，那么这种

同化并不指出了阶级的消失，而是指出了为保持现存制度服务的那些需要和满足被下层人民共享的范围……”。马尔库塞认为悲剧在于：人的对正在被现存制度所同化这一点恰恰是茫然不知的。而这种现状就包含了自由主义为极权主义所取代的可能性。富裕社会凭借“大众传播媒介”如电视、广告、电影、广播等手段，消灭了从思想上颠覆和改变现状的文化，“人们成了文化机器上的齿轮”。人们虽然有了更多的闲遐时间，却因为被商业和政治所支配，结果仍然是不自由，仍然被控制。无产阶级被单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体系所同化、吸收，为自己的工业生产力所奴役，革命意志减弱，双面人因而成了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的这种分析不可谓不深刻和广泛，但其中也时时让人感受到技术决定论的阴影和阵阵忧愁之情。出路何在！唯有依靠认识这种“单向度”威胁的“社会精英人物”，才有可能摆脱发达资本主义的这种整体控制。在马尔库塞的设想中，这些“精英人物”除了象他这样具有哲学思辩能力并用“醒世恒言”唤起民众的哲学家外，主要还包括激进的新左派大学生、嬉皮士、被社会抛弃而压在社会底层的人如流浪汉和黑人贫民、越南游击战士等，斗争方式则是“大拒绝”。

可以这样说，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分析和批判是入木三分的，其中有不少值得认真思考和正确剖析的问题。但他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开列的“济世良方”是不成功的，他的革命理论转化为实践是失败的。这点已为60年代末欧美青年学生的造反运动所证实。

马尔库塞的一生中，其批判锋芒所指也不尽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苏联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例。他对苏联社会结构及制度的剖析，揭露了其制度官僚化的固有弊病，但这种批判的最大弱点是缺乏社会的具体分析，企图依靠一种纯粹的、未受污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提供判断苏联现实的标准，并重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这实际上正反映了他的另一主要特点：即充满理想精神，但这种精神却又常常是青年黑格尔派观点的再现。

马尔库塞从青年时代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就带有自己独特的“创新”色彩。他追求一种“能超越特定时间和地点及特定思维结构的说明”，这实际上是本质范畴（概念）的同义词。因此，他的早期著作就具有浓重的“思想概念决定现实”的黑格尔哲学的气味。这个特点极大地影响了他对哲学史上一些伟大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阐述，这

也许与他早年醉心于黑格尔哲学有关。以后他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赞扬也正是立足于这样一种本质主义的会场。马尔库塞对资产阶级现代文明的分析批判正是这种观点作为理论指导的。他的结论是：精神界（本质上存在）与物质界（外部世界）的分裂，正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特点，资产阶级只有凭借政治化使个体屈服于社会制度才能保留现存制度，这也恰恰是对（精神）内在世界中个人仅有的一小块自由领地的攻击。自由和幸福紧密相连，资产阶级时代这种对自由的限制，实质上也就是对幸福的限制。

重视哲学的力量，注重对人的欲望、行为与痛苦、自由与幸福问题的探讨，这正是马尔库塞多年来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与自己的导师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相结合的结果，并因此而与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把理论夸大为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的观点相象。如同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这是把仅仅是理论推论的因果效用夸大成了社会的力量。这种“批判”的实践固然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人们的愿望与焦虑，但是把哲学的批判视为一种自我实现的“绝对理念”只能说是对精神力量的一种“理想化”。这使得马尔库塞以后对马克思关

于资产阶级社会和经济的分析的解释同样带上了“理想化”的色彩。这样，不知不觉之间，马克思“变成了”黑格尔，能够改变现实和思维局限性的“绝对精神”又在《资本论》中被马尔库塞重新展现。这种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特征构成了把握马尔库塞一生主要著作思想脉络的主线。

《爱欲与文明》与《单向度的人》可以说代表了这种理论特点的新发展和具体化。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用异化和人的性欲来解释人类文明，爱欲成了人类一切事物的中心和理解异化的社会制度的核心；这无疑是费尔巴哈把“爱”视作理解人的要素的观点的现代化。《单面人》虽然已不再使用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但是对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青年黑格尔派式的分析仍然处处可见，并导致他完全忽略民族传统和其他文化的非技术因素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悲观地把英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与纳粹的极权主义相提并论，急切地希望用一种“纯粹的”“理想的”社会来取代目前这种技术垄断一切并为资产阶级作为控制手段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摆脱异化状态，取得人的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社会批判家加上浓厚的青年黑格尔派气息

的“理想精神”，似乎可以大致勾勒出马尔库塞这位本世纪西方社会革命理论和实践大师的主要形象。正因为马尔库塞始终不渝地对一切进行“批判”，他才成为一个人们普遍承认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人物，而不管你是否赞同他的观点，也不论你是喜欢他还是憎恨他。但是这种“批判”由于这位批判家的哲学和理论上的原因，往往又是“激进的”或充满理想色彩的。批判的深刻性常常伴随着理论上的空想和浓重的思辩气息，这些注定了他的理论观点会成为人们的兴趣中心和争议的焦点，也注定了这种理论的实践道路将是坎坷不平、充满曲折的。

本书作者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就代表了那种对这位社会批判家的思想进行“批判”阐述的观点。他的观点具有分析哲学家特有的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特点，因而在众多的评论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思想传记的著作中独树一帜，别具特色。麦金太尔对马尔库塞一生的主要思想和著作作了系统的、概要的介绍。这本书篇幅不大，但却能从历时性角度，把马尔库塞与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着重分析马尔库塞的理论渊源和特征；作者还从共时性角度把马尔库

塞放在与弗洛伊德及当代各哲学流派的关系中进行考察，探讨了马尔库塞的理论成为西方新左派运动“革命圣经”的原因。同时，如同本书的副题所说的那样，作者又对马尔库塞的观点展开“辩驳”。这个特点表现在各章结构安排上的“一分为二”，每章前半部分是介绍马尔库塞的观点及其形成史，后半部分则以评论分析为主（当然，偶尔也有夹叙夹议的形式），这点提请读者注意。

作者始终站在自己观点的立场上，对马尔库塞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批判。纵观全书，作者的态度是力图做到客观公正，并是十分严肃认真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阅读这本评传时，大可不必全部接受作者的观点，但麦金太尔的独特观点及其对马尔库塞思想的系统介绍会给人以某种启迪，并有助于我们全面研究马尔库塞这位当代西方风云人物的理论与思想，也有助于我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也正是这本小书值得一读的原因所在。

译者

1987年12月



Alasdair Macintyre

MARCUS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0

本书据纽约维金出版社 1970 年版译出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安延明 孙乃修 刘 铨

李 河 李鹏程 杨永德

张晓明 章建刚

目 录

传记注释

第一章	马尔库塞的早期理论学说	3
第二章	几个批判性的问题	17
第三章	马尔库塞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阐述	26
第四章	对弗洛伊德的重新阐述：《爱欲与文明》	50
第五章	《苏联马克思主义》	69
第六章	《单向度的人》：对当代社会的批判	79
第七章	《单向度的人》：对现代哲学的批判	95
第八章	马尔库塞的革命纲领	113
	片目提要	122
	译后记	124

传记注释

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年生于柏林。他是柏林大学和弗莱堡大学的学生，在弗莱堡大学他跟随海德格尔进行研究，并以一篇关于黑格尔本体论与其历史哲学的关系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纳粹取得政权时他离开德国前往瑞士，在日内瓦过了一年教学生活，然后前往美国。1934年至1940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工作，与麦克斯·霍克海默尔共事，此研究所是从法兰克福迁来的。随后，他在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处工作了10年，在那里他最后升为东欧科的代理主任。然后，他重新返回哥伦比亚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和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最后写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一书。1954年至1967年他在布兰

第斯大学执教，并在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校以研究室主任的身份工作了一段时期。从1967年起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执教。

第一章 马尔库塞的早期理论学说

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批判其他哲学，这不仅是为了真理（虽然这是最重要的），还因为无论一个哲学家的意愿如何，哲学思想总会在社会、道德、政治生活中产生重大影响。现代生活的一个特点就是：那些最关心思维严密性和真理性的哲学家，大多往往对这种影响漠不关心。而那些异常关心自己理论的社会影响的哲学家，在理论上却又大多粗枝大叶。缺乏严密性，因而不是通向真理大道上的可靠向导。

赫伯特·马尔库塞已被他的一些信徒拾到了一种先知的地位，当然他自己并未要求获得这种地位；因此，如果只从这点出发来评判他的思想将是很不公正的。但他确实想维护这样

一种形象，即一个对现代思想及其与现代社会的关系进行坚持不懈地批判的批判家的形象。作为这样一个批判家，他对政治上的左派一直是一个有影响的领路人。因此，任何想对现存社会秩序作出激进批判的人，都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马尔库塞说得对吗？在这部书中，我的关键性论点是：几乎马尔库塞的所有主要见解都是错误的。正因为我要坚持这样的观点，我将承担特殊的义务，即忠实地描述马尔库塞的全部观点。为此，我必须把对他的理论阐述部分与对他们批判的部分前后分开。在按年代顺序区分马尔库塞的思想时，我完全按他自己的思想发展线索加以说明，只有他早期的论黑格尔的博士论文和他同时期的论马克思的一些文章除外，我没有把这些文章与他晚年思想分头讨论。马尔库塞作为一个青年学者，完全是德国学术和哲学传统的一个产儿，在弗莱堡他崇拜并师从于海德格尔就是一个例子。要是他不受这种环境影响又会怎样呢？马尔库塞后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理论学说，却正得力于他脱离并反对这种思想的传统。他的这种批判态度，部分是出于纯粹哲学的原因，部分则是由于他认为已发现了这种哲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的不幸的性质。

马尔库塞在纳粹取得政权时获得博士学位，那时他似乎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按照这一观点，纳粹主义获得政权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政治上的表现。马尔库塞认为这不仅是指——虽然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德国的工业和金融寡头已与希特勒结成联盟，并想借此在消灭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及工会以后，能够统治工人阶级；而且马尔库塞还更激进地认为，纳粹主义代表了基于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所以在纳粹主义的哲学和理论中人们可以发现贯穿于整个资产阶级时代的种种思潮的最极端的表现。早期资产阶级社会的典型学说是自由主义，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曾产生过与自由主义思想同样的社会结构，却产生了极权主义思想。因此，人们也不应把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思想看作本质上是彼此对立的，倒不如说这两种思想是一对孪生兄弟，双方都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真正对手。在先前曾把反对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典型学说的地方，此时也由极权主义的（马尔库塞指的是纳粹的或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取而代之了，这种学说为了抑制批判，防止和取消这种经济关系的革命，必须动用国家机器以使全部

生活政治化。

显然，马尔库塞之所以接受这个观点，是受到了欧洲思想史上一些重要人物个人思想发展经历的影响。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金蒂雷曾写信给墨索里尼说，“自由主义，在我看来就是那种运用法律从而也就是运用作为伦理实体的国家的强制力量的自由的自由主义，在今日的意大利，代表这种自由主义的不是那些多少公开地是您对手的自由主义，而是您自己。”后来金蒂雷也加入了法西斯主义党。海德格尔，这位从胡塞尔的现象学转到存在主义的学者，也加入了纳粹党，并以大学校长的身份向他的学生宣称：“不要让理论学说和‘理念’支配你们的存在，无论现在和将来，只有元首才是德国的现实和德国的法律。”

马尔库塞认为金蒂雷和海德格尔代表了这样一种变化：即17、18世纪曾经是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哲学思想传统，现在已和非理性主义合流了。代替把人视为哲学主体的一般理论的，是一种关于种族和民族的特殊的学说。由于理性屈服于血缘和国家的力量，就阻碍了对这种种族学说的批判。马尔库塞从1933年到1938年的著作，主要致力于捍卫所谓的早期欧洲哲学理性主义的内核，以反对当时的非理性

主义。为了理解他如此做的原因，我们必须理解马尔库塞的哲学概念。

马尔库塞是从一种独特的德国人的视野来看待哲学史的，因此，他很注意古希腊，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而对中世纪则注意极少。他认为笛卡儿是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为后来黑格尔取得哲学史上最高成就铺平道路的康德。黑格尔以后，除了马克思，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身上。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在他看来是非常笼统和不精确的学说，维也纳学派是这种学说的主要代表，他之所以谈到他们，仅仅是为了驳斥它们。在所有这些方面，马尔库塞是与德国学院派哲学的主流相一致的。但在说明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是伟大的哲学家时，马尔库塞却以一种他特有的方式阐述了他们何以是伟大的哲学家。他认为，哲学的基本功能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批判，哲学能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为我们提供一种对思维结构的说明，这是因为它也为我们提供一种能超越特定时间和地点以及特定的思维结构的立足点。马尔库塞从不否认哲学的实践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但是，那种历史条件所强加于哲学的畸变的程度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因此，人们可以在哲学

史中发现一些这样的时期：其中哲学思想具有超越它当下现实环境的力量。

为进一步对这种哲学观点作出更清楚的说明，我们可以对照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方面的观点。恩格斯在1889年回顾了40年前他和马克思详尽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时，认为这个概念“结束了历史领域中的哲学，就象自然辩证法概念使得所有的自然哲学变得既不必要也不可能一样。”恩格斯指的是：历史和自然现在都从歪曲事实的研究方法及观点下解放了出来；代之以这样的观点：对历史和自然的进程都不可能直接进行研究。恩格斯同意把逻辑和他称之为“思维的规律”保留在哲学领域中；但他认为，要求哲学提供一种关于现实的本质的最终的哲学观点，归根结底是不足取的。他和马克思都已确实表明：哲学史绝大部分是意识形态史，思想的形式毫无疑问是第二性的，它来源于并反映经济基础和社会现实。

导致马克思产生这个关于哲学的观点的原因，正是以往的思想观点的抽象性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他嘲笑了黑格尔的抽象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认为黑格尔哲学是在用一种把人引入歧途的、抽象的方式描绘具体的人类条件。而

且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看来，这种抽象总是有害的。马尔库塞则不这样认为，对他来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哲学获得力量的源泉都在于同具体的和直接的事物相分离。因为哲学与概念、与思维的框架有关，哲学以可能性王国面对现实性王国。在不同的时期，哲学面对现实的方法有所不同。然而哲学史不只与那些和文化密切相关的、只属于一个特定时期的哲学概念有关，甚至和那样一些形而上学概念有关，那些概念的相互之间的关系，它们在概念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同具体现实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都是极为显著地不同的。

马尔库塞上述这些观点的意义何在？考察一下他1936年一篇论文中讨论本质(essence)概念的现代史的某些章节就可以明白。马尔库塞把现代哲学家与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前辈哲学家作了比较；后者用本质概念，是为了在具有真实性质的事物与仅仅在任何给定时期偶然发生的事物之间、在可靠的真实性与仅仅看来如此的真实性的区别。马尔库塞认为：这些哲学家对事物的所是和能是作出了正确的区分；阿奎那和17世纪的哲学家不是以这种与古希腊相同的方法作出区别的，但总是具有了某些区别的观点。然而人们在胡塞尔

的现代现象学那里发现的却根本不同。胡塞尔声称他正在重做笛卡儿的工作，他也确实区分了本质和存在。现象学在研究呈现在意识中的一切时，变成了研究本质的理论；正是那属于一切出诸偶然的现实世界的事物，在其意义的领域中，才“具有一个实质，因而具有一个就其纯粹性来把握的本相（eidos）”。现象学通过对事物的单纯的事实性和时空中的属性进行抽象把握了事物的本质。但正因为现象学家是从事物的所是出发来达到此种抽象的，他们就抛弃了任何关于现实性和可能性之间存在根本差异的观点。在马尔库塞看来，现象学家对可能性的论述，必然是以他的整个操作方式为前提的现实性世界在另一层次上的再版而已。胡塞尔声称，现象学的方法致力于描述，这是现象学的一个优点，但正是这种单纯的描述方法，马尔库塞认为是要受到谴责的。在坚持本质和存在的区别的同时，现象学事实上放弃了对它自身最重要功能的区别。

如果现象学就如此被打发的话，那么，实证主义则受到了更加简慢无礼的对待。在胡塞尔的描述性观点中，马尔库塞看到的是实证主义对现象学的有害影响。因为，他把在本质领域和现实领域之间不能作出区别的观点看作是

实证主义者的理论。他所引的实证主义者是莫里茨·石里克：“没有任何事实能逼迫我们在两种不可通的实在之间进行这样的比较、或为我们的这种比较作证。”因此，马尔库塞把实证主义的观点归纳为：“就知识而论，所有的事实都是等值的。所以，事实的世界是单向度的。”^①石里克在批评两种存在领域的学说时这样说过：“一种存在被认为比另一存在更高级、更真实、更高贵和更重要，如此等等，因而就引进了一个进化的概念。”马尔库塞对此没有进行争论，他认为这种观点是合理的，石里克之所以提出批评，是因为他在事实和价值之间作了一种错误的区分。“实证主义坚持资产阶级要求的无假设的、纯粹的理论的理想；根据这种理想，缺乏‘伦理上的中性立场’或接受某种观点，严格说来就是一种失误。”

与现象学和实证主义相对照，马尔库塞赞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这恰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既能正视人们在此刻碰巧所是和所能是之间的差别，又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状况和在该社会中人们所具有的虚假意识之间作了区别。它又重新恢复了本质概念的中

① 《否定》（Negations）1968年波士顿版，第65页。

心位置。这样，我们就不再受限于事物的所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既定事实是作为现象来理解的，这种现象的本质仅在联系到一些特定的历史趋势时才能被理解，这些历史趋势趋向于现实的不同形式。”本质的结构为历史的发展所揭示，本质的领域不是一个静态的、无时间的柏拉图式的领域，而是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在任何时刻，事实只能部分地和片面地揭示出本质的结构，事实只有按照这个结构才能被理解。而且历史结构的知识就是赋予我们一个对现存实在进行批判的基础。

“理论的历史旨趣在本质上进入到它的概念体系中，并使得从‘事实’向本质的超越具有批判的性质。”^① 我们根据所能是者评判所是者，并且通过我们的将是者的知识，即历史趋势的知识辨认出此种所能是者。

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中，“由于本质问题和社会实践在根本上结合了起来，这样就通过使本质概念适合于人的本质的办法，在与其它一切概念的关系上重建了这个概念。”^② 根据马尔库塞的观点，人的本质是一个理想，它构造我们当下的实践，并指引这种实践走向

① 《否定》，第71页。

② 《否定》，第111页。

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目标；这种新的社会方式将能真正实现“人们按其潜能理解自身时所欲实现的一切。”

马尔库塞把对现代哲学史的解释置于对现代文化史的更一般的解释之中。现代文化有两个关键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从早期资产阶级时代的肯定阶段向否弃阶段的转折。在肯定阶段，形成了以精神和心灵世界为一方，以物质世界为另一方的尖锐的区别。精神与心灵世界本质上是内在的；它对个人具有无条件的权力，比物质世界所创造的一切远为优越。个人则被要求根据精神的原则改造他自身，即使物质世界保持不变，这种改造也是可能的。“在资产阶级诗歌中，恋人们在反对朝三暮四的口号中恋爱；在反抗现实的要求、反抗对个体的奴役中恋爱；也在反抗死亡中恋爱。”^①但在日常生活中，恋爱并不是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所创造的，而是资产阶级经济所创造的，越来越成为一种出自义务和习惯的东西。

这个日益加深的内部与外部世界的分裂正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特点。正因为这裂缝已加深了，所以就有了一种十分强烈的需要，来表达

^① 同上书，第111页。

外部社会生活中不能再发现其位置的“内在”世界。浪漫主义观点中的灵魂概念变成了人格的概念，这种人格概念必然试图去实现无法表达和不可达到的愿望。无灵魂的那个部分是物质生活的领域：灵魂追求一种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理想美和理想幸福。当资产阶级通过彻头彻尾的政治化、通过使个体整个地屈服于那种制度，最终使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得以保存时，这个个人还保留着摆脱资产阶级生活的外在要求的一小块个人自由领地的内在世界就必然要遭到攻击。因此，新的极权主义必然要攻击过去的资产阶级文化，以保留当今的资产阶级经济秩序。

马尔库塞分析现代文化史的第二个主题，是关于自由与幸福的关系问题。根据他的观点，自由和幸福是密切相连的。“幸福，作为个体所有潜能的实现，以自由为先决条件……从根本上说，它就是自由。”因为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资产阶级时代的道德哲学家都承认，就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而言，人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反对把任何依赖周围环境的快乐概念——即使是一个专用概念——作为人们的理想。资产阶级时代受限制的自由概念导致一个更受限制的幸福概念。而且，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享乐，它与必然受到工作与市场的强

制的那种个人有限的自由相关联的。享乐与闲暇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并因此贬值了。这种享乐由于与性欲联系在一起就更是彻底地、空前地贬值了。斯宾诺莎在谈到肉欲快乐时这样写道，仅在快乐是为保持健康所必需时，我们才可以“沉缅于快乐之中”。费希特写道：如果人“由自身中生产新人的原始能力”被“用作为一种感官享乐的手段”的话，那将是“绝对的耻辱，就是抛弃真正的人性和男子的光荣。”在费希特时期，生育仍然服务于资产阶级婚姻的目的。当资产阶级社会变成独裁主义和专制主义时，在生育和享乐之间的分离同样还存在着，现在生育是为国家的目的服务，即生产工人和士兵。

根据马尔库塞的观点，资产阶级社会不考虑幸福事实上还有着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不能够调和特殊的幸福与一般的幸福。强制实行某种工作纪律的社会，只有在人们被引导到为自己的利益判断工作价值时，才会被容忍，这种社会的制度是剥削的、竞争的、从而也是分裂的，它必然要压抑享乐的愿望并把它引向有限的个人目的，从而也常常成为人们挫折和毁灭的根源。相比之下，

“性的原始的、非理性的发泄，是这种享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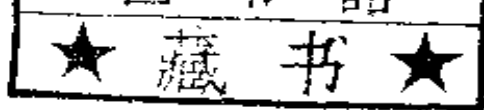
最强烈的发泄和劳动因其自身缘故的全部贬值。”这种发泄使个体感到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完全得不到满足，因而不再能容忍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同样，只要存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性欲就必然是受压抑的。

上述思想在马尔库塞发表于1934年至1938年间社会研究所的《社会研究杂志》上的大量论文中得到了阐述，当时社会研究所已从法兰克福大学迁移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1933年—1934年马尔库塞在日内瓦教学，然后前往纽约加入社会研究所，成为研究所的创立者麦克斯·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的同事。这些早期论文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形成了预示全部马尔库塞后来著作的最初的观点，在某些方面，这些论文比他以后的著作更清晰明白，而且也表现了他和马克思主义的相异之处。因此，我们暂不忙评论马尔库塞的思想，以便我们提出一些能更深入地说明马尔库塞全部理论性质的关键问题。

第二章 几个批判性的问题

对马尔库塞观点的批判遇到了两种困难。一是由他坚持的那些独特论点引起的困难，二是由他的整个思维方式和表述风格所引起的困难。马尔库塞的风格既文笔优美又学究气十足。他好用比喻，并且总假定他的读者不仅有高深的文化素养，而且还在学术问题上与他有广泛的一致性。（在对笛卡儿的解释中情况就是如此，这只是一个例子）这种表达方式是作为德意志帝国教授文化的一部分发展起来的。它并不要求提问，而是认定教师是向学生传授真理的，而学生只能接受。马尔库塞著作的英译本不象德语原著那样咄咄逼人，也许只是这种表达方式的奇特带来了某种迷人之处。

这种表达方式难免带来某种实质性的困



难。马尔库塞很少提出（也许是从未提出）理由让人相信他的观点的真实性。他经常对自己的论题作一些附带的说明，但他从不系统地提供论据。此外，在他的著作中几乎从不从自己方面提出或考虑由他的观点可能产生的困难，因此，也就从未企图去解决这些困难。当然，从马尔库塞好以断言代替争论，并且不为他所说的一切的真理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些情况，并不能就认为他说的都是荒谬的。下面我将提出四个初步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可从我上面已提到的问题中引出；马尔库塞在他早先和后来的著作中，多次谈到他所反对的真理标准问题。他自己的真理观是什么呢？他请我们接受他的论点时，并没有说清他打算接受或寻求何种真理标准。由此，在弄清楚马尔库塞关于真理问题的确有何见解时产生了两个附带的困难。马尔库塞把真实的存在同实际的存在相比较，拒绝任何象经验论那样的与事实相一致的真理概念。在他看来，受制于如其所是的事实(He facts as they are)，就会过渡到不真实。但他这样说时却从未告诉我们怎样去确定事实实际上是什么 (the facts-actually are)；而他关于文化史的解释的真实与否却要依赖于事实。并且，所有的论文和

论点都依赖于人们互相承认真理和合理性的共同标准。当这些真理标准本身成为哲学中合理中争辩的问题时，弄清如何从这些尚待规定的真理标准问题中得到真理，就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由于第二个附带的困难变的更为尖锐。马尔库塞有时认为，似乎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真理标准——这和他的某些其他观点起码不是不一致的。可是如果真理是相对于时间和地点而言的话，我们怎么能判断分属于不同时间和地点的两种理论呢？显而易见，这里需要的是一个非人格的、非相对的真理概念。

我的第二个批判性问题是：马尔库塞怎样证明他对文化史的大肆筛选的做法的合理性？这个问题可分解成这样几部分：第一，马尔库塞怎样证明他对哲学史的大肆筛选是合理的？这里的删节是显而易见的：洛克和贝克莱、狄德罗、爱尔维修，以及达朗贝尔从未露过面。休谟也几乎没有提到，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只是一带而过；介绍了尼采，却没有叔本华；提到了石里克，可漏掉了马赫。这点为什么重要呢？答案是：由于遗漏了这么多哲学家并对那些他所求助的哲学家作片面的阐述，马尔库塞便能够夸大，有时甚至是粗暴地夸大特定时代

哲学思想的同一性质。我不否认我们能经常感受到彼此争辩，极不相同的哲学理论中所具有的同一种文化因素的特征；这些哲学理论或许还都以一个共同的世界观为先决条件。但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情况是否如此还有待研究。

如果马尔库塞的哲学史是可疑的，那么他的一般文化史就更是如此了。一方面，他显得太喜欢用他自己的哲学史观的透镜来解释文化史；另一方面：他甚至不能充分地运用文献的论据。我们可以举另一位马克思主义作家路西安·哥德曼为例作一个有趣的对照。根据马尔库塞的观点，早期资产阶级时代（通常不确定地点）是一个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时代，笛卡儿则是一个典型。而根据哥德曼的观点，那个年代的法国深深地被打上了悲剧的生活观的标记，对笛卡儿必须用帕斯卡的观点来评价。当然，将哥德曼与马尔库塞相比较是不公平的（哥德曼的论点在各个方面都比马尔库塞的观点要坚实得多），但却提供了一种对照，使人们注意到马尔库塞历史著作的随意性。

我的第三个批判性问题，关系到马尔库塞的关于哲学理论与政治和社会义务相互关系的见解。这种相互关系是怎样建立的？肯定不会

由一个哲学家的学说与其在这类问题上所承担的义务之间任何实际的相互关系建立起来。马尔库塞把现象学与经验论视为标志世界进入极权主义的学说，在他早期著作里的极权主义指的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独裁主义。但事实上，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是激进分子和社会主义者，是全体一致地反纳粹的。现象学家的政治记录也是良好的（爱迪斯·斯泰思，这位胡塞尔的秘书，后来成了一个修女并死于集中营）。海德格尔和金蒂雷事实上是极其例外的人物。马尔库塞怎么能把他们这两人作为代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呢？

假设这样回答，即哲学理论和社会或政治态度的联系是一种内在的概念联系，那么马尔库塞所责备的就不是那些因具有某些学说而更可能采取一定政治态度的人，而是那些学说本身就在以某种方式适合于那种政治态度。一切问题然后就都转到了怎样才能详细说明这种适应的标准和尺度的问题上了。对于一定的理论观点来说，这一点是完全有可能达到的。例如，把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和道德理论看来是依赖于这样一种观念：个体在其价值选择中是独立自主的。事实不会也不能强制个体作出这样的选择，只有自由的个体自身才有权作出决定。

者，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理解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他反对仅作为意识形态的浅薄的文化和哲学观，除此以外，马尔库塞还提出了什么有所不同的思想呢？这一点很难说，比如他对全部经济问题的见解只是断言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趋势。马尔库塞这阶段的理论为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义务所支撑着，因此，其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程度不能仅由他的著作来测度。在政治上，他的确寄希望于苏联和西班牙共和国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但是除了这种最一般形式的政治义务外，再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影响到他的著作了。

然而有一点马尔库塞却与马克思主义迥然有别，这种差异不在于文字的表白上，而在实践上。这与他的哲学观点有关，因为涉及到他对抽象方法的偏爱。马尔库塞喜欢无休止地谈论（抽象的）“人”（Man），而不是（具体的）“人”（Men）^①他喜欢谈论（抽象的）“人”的欲望、行为及痛苦。这里我们最好引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马克思将某些德国思想家和那些喜欢在经典手稿空白处描

^① 英语Man为单数的人，意即抽象的人；Men为复数的人，意即具体的人。——译注

写圣徒生活的僧侣作比较：“德国著作家用相反的态度对待世俗的法国文献。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批判货币关系的法国原著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批判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国原著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废除’等等。^①确实，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正因为“他说的是‘一般的人，’而不是‘真实的，历史的人’。”他批判费尔巴哈和格律恩的“人的本质”的说法。

马尔库塞与受到马克思抨击的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相似之处只是表面上的吗？或是否只是一个风格和表达方式的问题？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不是因为他们黑格尔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不是把黑格尔的理论改造成用以指导当代社会经验现实的理论，而是把它当作一系列抽象观念，用这些抽象观念他们只能歪曲地观察当前的社会。用马克思的观点来看，这种歪曲就在于：他们将仅仅是理论推理的因果效用夸大为改造社会的力量。这些批评是否也适用于马尔库塞呢！检查一下1934到1939年期间他的早期著作就可知道这些批判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译注

同样适用于他，我们至少应这样考虑这个假设，即马尔库塞不是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是一个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已退回到“批判”的实践（青年黑格尔派使用过同样的术语），而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在考虑这个假设时，考查一下马尔库塞对黑格尔的阐述是极为重要的。我现在就要讨论这一问题。

第三章 马尔库塞对黑格尔和 马克思的理论阐述

1941年，马尔库塞发表了《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他一开头就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把黑格尔哲学与法国革命联系起来，但他不必接受我曾提出过的对他联结哲学和政治的企图的批评。毕竟是黑格尔自己首先坚持了这种联系。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历史哲学讲座上谈到的正是法国革命：“自从太阳高悬于天空并且有行星绕它旋转以来，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人的存在以头脑为中心，即以思想为中心；受思维的激励，人才建立起现实世界。阿那克萨哥拉第一个说‘努斯’（精神）统治着世界，但直到现在，人们才提出并认识到思维应该统治精神的现实的原则。这是一个辉煌的精神的开端，所有的思维存在物分享了那时

代的欢乐。”但在黑格尔看来，如果现实不过是首先在法国革命的行动中达到意识的思想的外化，那它首先是以哲学形式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意识的；而且黑格尔准备在阐述他的哲学时，去发现相伴随的世界历史的事件。

为了说明黑格尔思想与法国革命以及紧接其后的时代的关系，我将首先对黑格尔的哲学作一必要的并且是极概括的叙述，并指出那些在解释上存在严重争论的关键问题。然后，我将考察在众多黑格尔哲学阐述者中马尔库塞的立场。最后我将考察他从对黑格尔的研究中吸取了哪些思想、特别是将哪些思想用来阐述马克思。

康德认为：我们之所以能认识这个世界并掌握它的真理，仅仅是因为心灵为其知性规定了一整套范畴，并通过这些范畴把在经验中所给予的东西组织起来。经验永远不是直接给予我们的，必须经由范畴的中介。我们所认识的事物之所以有确定的性质和关系，是因为思维加之于世界的概念构架使无形式的东西具有确定的形式。而且知性范畴一经确定便永远如此；心灵自身具有确定不移的结构。

黑格尔接受了康德的这个中心思想——我们能够将世界看作如此这般的世界，原因为思

想框架赋予世界一个结构。但随后他即从两方面对康德主义者的立场提出异议。康德在我们理解的实在和实在本质之间，被感知的事物与自在之物之间作了明确区分；后者无论在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不可知的。黑格尔反驳说：如果实在本质和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话，我们就不能知道它们、也不可能知道它们的存在；因此，我们须认为实在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实在，超越经验和在经验之外无物存在。但黑格尔没有进一步得出结论说：迄今为止人们所宣称的涉及不可经验的实在的上帝、心灵等观念都是虚假的；相反，他认为我们必须理解这些观念，把这些观念看作对于我们所经验的世界的一定面貌特征的断言。黑格尔始终是个一元论者。

其次，黑格尔批判了范畴的无时间性和无变化的观点。思想史就是一个概念框架变化的历史。解释特定时代的范畴不能与解释这一时代的思想框架相混同。为了说明思想框架，必须写一部历史，即一部展示意识和自我意识两方面的生成历史。正是通过认识现实的思想模式，人们才能批判这种模式并合理地超越它。这样一部历史的终点和顶点就是对全部思想历程的理性的理解，在这个顶点上将会看到理性的完成和在崭新意义上的绝对知识的实现。黑

格尔的哲学著作则代表了展现这部历史的持续不懈的努力。但他仅有一部著作试图描写人类理性的完整发展史：即1806年写成于耶拿的《精神现象学》。据传说（也可能不足为信），黑格尔写此书时，耳畔正回响着耶拿战役拿破仑军队的隆隆枪炮声。耶拿战役标志革命后拿破仑王朝在法国和欧洲的鼎盛，这次战役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

《精神现象学》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是一部哲学史，黑格尔不仅回顾了过去的哲学观点，而且还详尽地描述了一切可能的哲学观点。（试图完成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尝试，的确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从他预言的某些哲学观点仅在后来才由其后继者和批评者所建立，可见他的非凡天才。例如，在《精神现象学》中能辨认出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及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的大概纲要，以及对这些观点的驳斥。）对黑格尔来说，哲学家所了解的思维形式是那些使文明活跃发展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哲学推论。因此，他在《精神现象学》中把哲学史置于整个人类精神的历史之中，对所有的艺术、政治、宗教一一地加以回顾审视。而其展示的样式，就是黑格尔在对古希腊城邦国家和他当时所在的德国进行比较的

反思过程中所精心构思的样式。

在黑格尔最早的一些著作中，他从古希腊的城邦中看到的是一种个人能在其中发现与其政治共同体及国家观念一致性的人民共同体形式，个人不把后者看作凌驾于自身之上的异己力量，而是看作自己真正的家园。在这种共同体中，政治和宗教融为一体，这样个人就既有一种尘世的关系，又有一种使他能与尘世关系的束缚相分离的更根本的对天国的效忠。在现代世界中，个人和国家是对立的。这部分地是犹太基督教传统造成的历史结果，它赋予了人们无限的可能性和理想，使人们把他们地上之城的公民身份看得比天上之城的公民身份要低下。为了恢复人类本质已丧失的统一，有限和无限必须重新结合，黑格尔把这种恢复看作是历史的目的，一个内在地构成历史发展的样式的理念。

人们从早先的统一形式发展到不统一，然后又更高的水平上重新统一。他们从自身向外发展，把世界看作既定的并独立于人的理性之外的客体，然后才懂得正是理性使人及人的世界成其所是。因此哲学的任务是要让人们重新感到在这世界上犹如就在家园。对象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异化的过程。人们把实际上正

是他们自己活动的产物，即仅由于他们自己的活动才得以维系其存在的东西——如道德和国家——看作是有其自身生命的异己力量和压迫力量。理性的繁盛与异化的消除有关。现在我们就可知道黑格尔相信自由和理性密切相关的原因了：人们只有抛弃对外部世界和彼此之间的一切虚假的依赖关系，才能做为群体真正地理解自己的历史和现状。要想自由，就必须懂得什么能够改变、什么不能够改变。要想合乎理性，就必须把自己看作是历史的目的。

每一个时代都是一个由人们的种种关系组成的整体，一个有自己的概念框架和制度体系的总体。黑格尔的这个观点看起来会与以后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家的观点十分相似。对后者来说，各种社会和文化都是由各组成部分互相关联的系统，每个组成部分都对维系整个系统作出贡献。相反，黑格尔却认为每种社会制度都包含着分歧和矛盾，都潜藏着互不相容的对立原则，所以，要充分发挥一种特定的社会的潜力，总要引起矛盾、冲突，并导致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转变。

让我们以黑格尔对18世纪革命爆发前的社会的一些分析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一方面，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社会，他为个人应该追求

个人幸福的准则所指导。但是，只要这个准则被确立为一种社会规范，人们就试图以此指导全部生活方式，而这就产生了矛盾。因为想要使自己幸福的那个人也总被要求让其他人也得到他们自己的幸福，但恰恰是那些也这样行事的其他人，变成了他获得幸福的障碍和敌人。这个矛盾要求在理论和社会制度两个领域中得到解决。在理论上，功利主义哲学家们诉诸于对动机的同情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概念。在社会制度领域中，大革命前的国家中的市民社会的个人主义遇到了相似的情况，那时国家声称不是代表特殊利益而是代表普遍利益的，并以此为名进行强制性的管理。国家的这种做法从个人观点来看，必然是专制的。

两种解决方案必然是矛盾的。每个人对自己幸福的追求与其他人对幸福的追求是正相矛盾的，这就不仅带来调和不同利益的问题，并使得一般地概括幸福和实行所有人的幸福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共同目标完全不可能。因为这个目标与个人的目标有冲突，就象某一个人与其他个人的目标有冲突一样。同样，因为不存在普遍利益，国家就不可能代表它，只能装作如此；实际上，国家的作用只是保护某些特殊的利益，即特权和统治阶级的利益。结

果，不但没有解决个人主义所带来的冲突，而且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的国家自身就变成了一种自由和理性的障碍，正因为如此，它最终被推翻了。罗伯斯比尔宣布：“不是武力而是理性的力量，将会传播我们光荣革命的原则”。“在真理面前，所有虚幻都将消失，在理性面前，一切愚昧都将被打倒。”马尔库塞注意到：黑格尔也许自觉地对这些话产生了共鸣。

但黑格尔也承认，大革命不仅创造了自己的虚幻物和愚昧，并且用武力和恐怖保护了这些东西。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革命自身代表了并传染上了市民社会的个人主义，革命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只能是毁灭性的和否定性的；它只能把社会制度看作是自由的障碍。对于能够超越市民社会个人主义的竞争并能积极地实现自由的社会制度问题，黑格尔在1807年仍是模糊不清的；后来他打算将拿破仑支持的肯定的社会制度同革命所崇尚的对自由的否定的追求作比较，他认为拿破仑是“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上千项低级司法审判权和王侯遗嘱的废除，《拿破仑法典》的制定、市民平等权利的创立、牧师特权的取消等等；这些就是黑格尔所看到的在社会制度中用理性取代非理性的措施。

如果黑格尔想在拿破仑那里看到罗伯斯比尔政治的延续和黑格尔自己的哲学的更精确的政治对应物的话，他所处的时代的状况就必定向黑格尔哲学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因为在黑格尔哲学中，理性最后变成了真正的自我意识，它知道自己发展的全部历史并因而达到自身发展的顶峰和完成形态。绝对理念以理性的形式实现了自身；因此可以说黑格尔哲学是一以贯之的，他写作《逻辑学》时，他的笔是在书写上帝的思想。但由于哲学史仅是理念自我发展史的一个部分，仅仅是全部文化与制度史的一个中心线索，黑格尔时代的种种制度也须以同样的方法来表现理念的自我发展。照此推论，满足了理性最终出现的条件，则自由最终出现的条件也必定已经成立。如果说黑格尔哲学确实是理性的展现的话，那自由又在那里呢？

黑格尔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后来也改变了。他依次考察了雅各宾派、拿破仑、拿破仑失败后主张哲学家必须暂时退出政治舞台的观点，以及普鲁士的君主制度。黑格尔承认：市民社会的竞争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所致；只有国家能超越特殊利益，也只有国家能在社会制度中代表真正的理性。黑格尔关于在拿破仑占领后的普鲁士君主国家是理性国家真正代表

的论点是异常虚弱的，所以根本不值得对这些论点进行详尽的批评。应该看到：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顶点的说明无论在政治学水平还是在哲学水平上都是模糊不清和十分晦涩的。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展示了理性在其中达于顶点的绝对知识的形式，这是一部研究精神范畴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著作。它的精华不在于黑格尔范畴系统的细节，而在于他认为没有什么范畴的运用是自我证明的。人们总可以心存保留并要求说明范畴是如何运用的、何以得到证明的。我们用以如此说明的范畴，还可再被提问，并以同样的方式被超越。例如，在谈到量的范畴时，黑格尔指出：当我们把数学应用到一个论题上，把我们的观点和理论形式化时，数学化和形式化的证明用的必定总是其他的专门术语。因此，对任何过程——不论是形式的还是其他的过程——所必需的哲学证明，都必须是超逻辑的，以此避开形式化的要求：“当哲学逃往源自科学的逻辑形式时，这正表现了哲学的虚弱无力。”在黑格尔看来，他的逻辑学与形式逻辑及数学不是敌对的，黑格尔并没有声称形式推理是不适用的和无效的。相反，黑格尔认为：不能因为要诉诸形式计算的规则而事先限制关于形式推理的可能性与局限

性的哲学观点。

那么，哲学推论的特点是什么？黑格尔的观点是：不要试图把形式真理同实质真理相分离。我们据以进行推理的概念不是那种其意义和应用标准一经确定就永久不变的概念，也不是意义和标准可任意变化的概念。理念正是在实际知识的生长过程中获得自己的生命的。因而，哲学最终是与科学相同一的，因为不了解一门科学的真理是什么，是不可能独立地研究那门特殊科学的概念的。就哲学具有的一种更特殊的功能而言，它提供一种综合的观点，它超越了那些实质上属于各门具体科学的概念系统和理论。

对黑格尔主义的这个纲要式的概括，使我们能深入讨论马尔库塞对黑格尔的解释。马尔库塞只是从黑格尔的《逻辑学》转向他的政治哲学时才可以说变得明确地富有批判性。他从黑格尔1815年后对现存制度的政治默许中找到了他错误的根子。他认为：不是黑格尔的理论观点有错误，而是在它被动用到政治生活中时犯了错误。显然，这与某些青年黑格尔派在某一阶段所特有的观点非常相象。但现在必须更尖锐地提出的问题是：马尔库塞总体上未加批判的黑格尔哲学的内容，是否真的与它本

身政治上的畸变无关？对这个问题，可以从考察马尔库塞关于解释黑格尔的两个典型问题的观点中得到答案。

第一个问题涉及到《逻辑学》的范畴与其运用于上的经验材料的关系。这里有两个相关联的观点是值得提出来的。黑格尔的注释者一般分成两派：一派强调范畴先于自然和历史，并且，理念经由范畴的自我发展是按照范畴间的自身关系来具体展现的；另一派强调这个“先在”只是逻辑上的，而并非时间上的，范畴除了体现于经验世界之中就不可能存在。黑格尔自己的学生在他死后，也在这问题上立即分成两派。老年黑格尔派采取了前一种观点，认为绝对理念永远不可能归结为时空中的有限现象；青年黑格尔派则认为：这个观点不过是恢复了黑格尔早已取消了的上帝和世界的有神的二元论。黑格尔自己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我认为，与其去追问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还不如指出他们各自对黑格尔著作的相应态度。那些具有老年黑格尔派观点的人，十分自然地把《精神现象学》看作是还不完全成熟的著作，它只不过是以后更多系统的《逻辑学》的一个导言而已。那些采用青年黑格尔派观点的人则倾向于认为《逻辑学》是一种误入歧途的抽象

思维的练习，它那范畴的系统易于给人造成一种确定性和终极性的印象，这点事实上正是黑格尔在他思想最成熟的著作中竭力要否定的。

十分有趣的是，马尔库塞却以极认真的态度，用《逻辑学》的观点解释黑格尔。他没有把《精神现象学》结尾处关于理性发展过程之顶点的含混费解的命题，看作是黑格尔理论观点已经步入歧途的信号。相反，他坚定地说，“《精神现象学》作为世界真理所提出的绝对知识，其基础就在黑格尔的逻辑科学中。”但是这只是在用后期黑格尔的著作来理解早期的著作，即用更抽象的观点来考察更具体的观点。这种观点忽略了黑格尔的理论究竟有多少经验性的成分。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写道：关于历史，只要涉及到纯历史的因素，就必须涉及到偶然性事实的问题。很显然，他认为这些是经验的研究课题。他对物理科学的态度显然也是如此。然而正因为如马尔库塞所说：“辩证逻辑将思想形式与其内容紧密相连；”也正象黑格尔自己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我们不可能从形式中推出偶然性的内容。正是在对人类发展广阔的经验认识的基础上，黑格尔才能制定他的思想的形式，这种经验认识是被暗暗

地引进黑格尔的哲学的。只有当某些经验的命题为真时，《逻辑学》的观点才能为真。马尔库塞看到了思维形式与经验的这种联系，但正象黑格尔自己在某些章节中所做的那样（虽然只是某些章节），马尔库塞也是头足倒置地来看这种关系的。他问道：“社会形式和社会力量中的同一和矛盾的统一意味着什么？用本体论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否定的状态不是对事物真实本质的歪曲，它恰恰就是事物的本质。用社会历史的术语来说，通常它意味着危机和崩溃作为规律不是偶然事件或外部的影响所致，而是事物本质使然，并因此提供了理解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础。”^①但这恰恰承认了我已表述过的观点，既黑格尔的概念系统，即使是用极抽象的术语加以表述，也具有隐藏着的经验的内容。这样，黑格尔概念系统是否运用于现实世界的问题，就是一个经验的问题。马尔库塞从来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因此他是毫无批判地接受了老黑格尔关于现实世界的同样观点。现在让我们转向马尔库塞关于黑格尔解释的第二个问题，以便更好地理解上述观点。

^① 《理性和革命》1954年波士顿第二版，第48页。

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包含有这样一个顶点的观念，历史在此顶点事实上结束了，并且整个历史进程能够在范畴的系统中被理解，这些范畴也不再需要修改。我已经指出，黑格尔把对这些范畴进行哲学阐述视为《逻辑学》的任务。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则正确地不愿意把现实绝对化和神化到如同范畴一样的程度。虽然在他看来，普鲁士国家是最接近理性的，因此是最后表现理念的真正的国家，他仍小心翼翼地不把普鲁士社会制度置于不受批判的地位。然而他的确滋长了支持君主制和反自由主义的观点。马尔库塞从这种做法的倾向中发现了一种趋向迄今为止仍存在的无个性的悲观主义的退却。这种悲观主义与《历史哲学》中普遍化的乐观主义困难地共存着。根据这本著作的观点，历史变化总是“发展到某种更好、更完美阶段的进步。”对黑格尔来说，在他有生之年肯定没有见到这些进步与变化。

马尔库塞攻击的仅是黑格尔对他那个时代发展的态度。他留下了整个绝对观念未加批判，这样他就为当代绝对化和神化的倾向（并非黑格尔所认可的倾向）开了方便之门。事实上，当马尔库塞从解释黑格尔转向解释马克思时，他恰恰是把说明绝对理念自我实现的黑格尔特

征加到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上去。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他没有将马克思受黑格尔影响多少不同的两个时期及其著作加以区别。《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都被认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地位的始终如一的说明，似乎马克思只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学说，在所有这些著作里都得到了贯彻。马尔库塞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清楚地说明了他对黑格尔的“绝对”何以如此令人惊奇地缺乏批判态度。因为马尔库塞实质上接受了黑格尔的观点：即哲学史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点。黑格尔完成了哲学；而马克思则创立了克服哲学局限性的思维模式，并发现了既能使我们改变思想，又能改变社会现实的思维模式。这样，黑格尔时代黑格尔派的特点——即认为历史的辩证法在这一时代达到其顶点，并将这一黑格尔主义的时代的现状加以绝对化和神化的特点——就变成了用马克思主义术语表现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其顶点的特点。“绝对”将出现在我们面前，然而这次不是读完《精神现象学》时发现的，而是在《资本论》中发现的。

根据马尔库塞的解释，在两种意义上，马

克思创立了在历史上，确切地说在史前作为意识最终成就的学说。因为不仅（象我已指出的那样）哲学现在要被超越，并且产生异化劳动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已发展到了能被超越的阶段。马尔库塞声称这后一种可能性是转述马克思的观点，但事实上用的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6年就已抛弃的黑格尔的术语。（应该注意，马尔库塞的黑格尔化的马克思理论，完全忽略了恩格斯作为权威的马克思阐述者的地位）。“每个事实都不仅仅是一个事实而已，它是对现实可能性的一种否定和限制。工资劳动是一种事实，但同时也是一种对能满足人类需要的自由劳动的限制。私有财产是一种事实，但同时也是一种人对自然的集体占有的否定。”“否定”一词在这里与“限制”一词同义。这使得两个词在逻辑上没有争议，但在政治上却颇有争议。由于每个事实是一种对现实可能性的否定和限制：如果正在下雨是个事实，那么这也不是事实，因为它是对不下雨这个事实的否定。如果一种可能性被实现了，另外的可能性，例如干旱或下雪就不可能实现。但是马尔库塞也认为，被实现了的事实所阻碍而未变成事实的事物有助于人的自由；在这点上他是忠实于黑格尔原意的。然而马克思早已

抛弃了将逻辑推理和理论评价仅仅归结为语汇的做法。事实上，马尔库塞确实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引了一段话，其中马克思就嘲笑了黑格尔的“更高存在”和“理念”等术语，在某种程度上，这使人想到马克思可能同样也将嘲笑“否定”一词。所以，要解释马克思而不提及马克思的这一变化是要走入歧途的。如果象马尔库塞那样，只是说“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对他的成熟理论来说仅是个开端，对此不应过分强调，”还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说马尔库塞把不属于马克思的成熟著作的那些黑格尔观点带入到他对马克思成熟著作的分析中的话，（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中确有某些黑格尔的概念；例如马克思的确保留了异化概念，虽然他也作了修改。这个观点是和象路易斯·弗沃尔这样的解释者的看法相反的。）他同时却又令人奇怪地把一种马克思从未有过的与黑格尔的决裂归于马克思。我已指出过，马尔库塞把自由和幸福紧密地联在一起，他认为黑格尔的理性的进步并不是一种向幸福的进步，并且显然是正确地指出，马克思比黑格尔更严肃认真地看待人类的需求。但是他然后断言，对马克思来说，一个真正人类的和自由的社会将是一个每个人都有可能实现他潜在能力

的社会（这就是马克思关于自由的含义）。他宣称，“人类只有当他们作为个人联合起来，并把生命的物质存在看作是能力和幸福的正常功能时才成为自由的。”^①他指出，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部分区别在于“理性的观念已被幸福的观念所替代”。

马尔库塞没有单引马克思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这个观点，这点很重要。马克思曾斥责过功利主义者所采用的幸福观。如果马克思想把幸福视为人类的目标，他肯定也会象功利主义那样说话的。一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肯定是功利主义者——考茨基就是。但多数人已经明白，自由的目标可能与幸福的目标不相容。托洛茨基认为：期望和成果之间的鸿沟，将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永恒特征，所以悲剧总与当时人类的经验连在一起。这个观点，看来比考茨基的观点更忠实于马克思。在这点上，马克思和托洛茨基肯定是正确的，而马尔库塞则无疑错了。

承认自由为一目标，就要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人们在运用他们的自由时，将会产生破坏、牺牲和不幸的情况。马尔库塞相信，人们必须是自由的才能得到满足，但十分清楚，

① 《理性和革命》，第293页。

在“幸福”和“满足”的任何一般意义上，当某些可能性还未向人们敞开时，他们可能会更容易满足或感到快乐。而某些人具有的造诣很高的音乐演奏能力或文学写作能力，却往往成为无穷无尽的痛苦和不满足的根源。因此，马尔库塞的幸福概念在自由问题上，是对马克思观点的任意的无根据的歪曲。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歪曲是在马尔库塞讨论马克思的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问题时出现的，马克思和马尔库塞两人都把这种转变视为从必然领域走向自由领域的一条途径。马尔库塞虽然承认，马克思确实预言了受规律支配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而且正因此是受规律支配的，才能精确地预言，但他认为：

“说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支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必然支配着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部意义的歪曲”。这样就可能把马克思本人也包括到那些歪曲马克思主义全部意义的人中间去了。马尔库塞恰好从《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了一段话，“资本主义生产，以一种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性，产生出自身的否定，”他将这一否定所产生出来的社会描绘成建立在“合作和共同占有土地及生产工具”基础上的社会。马克思坚信，无论是在必

然性控制下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向自由的转变都是受规律支配的。马尔库塞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把必然领域等同于受规律支配的社会生活领域，并且认为自由行动的必要条件是其过程不应受支配。

马尔库塞断言（就象他断言过的许多观点一样），这个观点是不容争辩的。当然，这个观点是经常被采用的。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说明：一个行动在充足的前提条件的意义上是有原因的，此等前提条件或独自或协力产生这个行动作为结果，那么构成为原因的事件或事态发生，作为结果的行动也会发生，不可能不发生。这样，如果一个行动是在这种意义上被引起的，这行动就是不自由的。但如果一个行动，通过求助于一条关于结果的规则或类规则的概括被正确地解释了，即“每当一个前行事件或如此这般的事态发生之后，这种行动就将发生，”，这行动很清楚是在相关意义上被原因引起。因此，就提出了这个论点：如果一个行动是受规律支配的，它就是不自由的。

如果这就是支持马尔库塞观点的论据，那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因为当我们视一种行为是不自由和非理性时（例如，我们对精神病人的不由自主的行为就是这样看的），是在此种行

为不受当事人自己的理性的控制、或者当事人适当考虑之下仍不能改变这个行为时，才这么认为的。但这里的例子还不足以说明由原因引起的行为。行为的原因必定是使行为者理性无法控制、理性思考无法改变的。如果某个人自己的理性思考是他行动的原因的话，这就成了自由和理性活动的二律背反。因此，问题并不是（象马尔库塞所假设的那样）一种行为是否有原因并受规律支配，而是原因和规律的特点和内容的问题。

马尔库塞的这个观点支配了他对19世纪晚期哲学思想的解释。在那时，以马克思、黑格尔为一方和以实证主义传统为另一方，是主要的对立派别。实证主义的基本思想是试图用自然科学的逻辑结构同化社会科学，这是马尔库塞所反对的。在马尔库塞看来，自然科学这种知识形式，不仅有别于由辩证法理论提供的知识形式，并且看上去甚至低于后者。在说明这个观点时，马尔库塞又一次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相背。更重要的是，他将自己的观点弄得令人难以置信。按照马尔库塞的说法，辩证法理论的要义是要展示那些人们能够实现但却没有被现时的社会生活所实现的可能性。现在，实际上可能的知识是关于哪种性质和事

件，哪种事物的状态事实上同时存在而且必须同时存在，哪些又不存在和不可能存在。因为，如果支配相关领域的规律是这样的：即一种性质或一类事件，或一种事态与别的性质事态以要么两者都出现，要么一方的出现排除另一方的出现的形式相联系，那么，某些性质，事件、事态的结合是可能的，而另一些结合则不可能。就是说，可能性依赖于哪一个规律或类规律的概括命题的陈述最后被证明为真命题，这一点对人类与对自然的可能性都是一样的。因此，未来人类可能性的知识依赖于那些将支配人类未来事物的规律的知识。然而，由上述观点就会导致马尔库塞关于未来的中心论点瓦解和陷于不连贯。这决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

为什么马尔库塞要用这种方法区分人类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为什么他后来采用此等态度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如果联系对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和《单向度的人》这两本书的评价，问题会更多。通过这些著作，我们也必须由马尔库塞是否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忠实解释者这类问题进而更明确地追问：他所说的这一切是否正确（不论他是否忠于黑格尔和马克

思)。

显而易见，马尔库塞对待黑格尔及黑格尔派学说的态度，既不是黑格尔本人的，也不是马克思的。马尔库塞应被列入左派或青年黑格尔派。他对待黑格尔主义理论的方法，甚至他以一种合理的水准提供给我们他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解这种做法（真实世界必须根据这种理解来判断），都加强了这一看法。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绘了持此种见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马尔库塞以后的著作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个描绘。

第四章 对弗洛伊德的重 新阐述 《爱欲与文明》

我已经在前面的讨论中列举出某些把马尔库塞与黑格尔派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其他著作家区别开来的观点，对此传统马尔库塞自诩得益甚多。我已特别指出他把（抽象的）“人”（Man）而不是（具体的）“人”（Men）作为历史的主体，使他与马克思有别；而在把“幸福”作为这种抽象的人追求的主要目标时，他不仅与黑格尔有别（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而且也再一次与马克思有别。或许正因为存在着这些差异，马尔库塞发现有可能在许多方面同时做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敌视心理分析派，对它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当然也不都是这样：托洛茨基就对心理分析有浓厚的兴趣，但是使

他感兴趣的似乎首先是作为治疗手段的心理分析，而不是弗洛伊德心理玄学理论。相反地，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心理分析方法过于琐细特殊。弗洛伊德的著作要求读者必须不断地从理论返回到病历、从他那被夸张的概念系统返回到展示治疗过程的细节中，或精确的经验观察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观察中，最终必将找到证明心理分析学说或真或伪的证据。马尔库塞在这里如同在别处一样，对经验的观察是不耐烦的。

弗洛伊德象马尔库塞一样，也用追求幸福的观点看待具有单一的本质的（抽象的）人，在此过程中，不断有挫折和失败。然而与马尔库塞不同，弗洛伊德注意去解释某些经验现象，如关于精神病的症状分析便引人注目。他第一次用无意识动机的概念解释歇斯底里麻痹症的发生，被麻痹的部位的紊乱与客观的生理事实无关，而与病人关于自己生理状况的信念有关（这是歇斯底里病人自己毫无所知的）。任何关于对精神病行为的可能的解释，当然都包括了如何区分精神病人与正常人的说明，或竟至于也包括了一种关于正常行为的理论。弗洛伊德就这样提出了一种人的发展理论，然后用一种并非总是系统的方法，把他的理论运用到艺

术、宗教和政治上去。值得强调的是，当弗洛伊德向此方向上努力时，他或多或少要从受经验控制的推理转向几乎必然是纯思辨的推理。而且，他思辨的这些领域中的经验例证，常常并不支持他的理论假设。然而，正是在这种思辨领域中马尔库塞紧紧跟随着弗洛伊德，这是一个真理和谬误的标准必定难以适用的领域。因此在评估马尔库塞的观点时，我们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

马尔库塞之所以认为进入这个特殊的研究领域是异常迫切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当马克思设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阶段时，他似乎预言了两个并行不悖的进程。一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的崩溃，他清晰地预言了这个崩溃过程：机械化和人的劳动的关系发生变化，市场扩张达到极限，垄断的趋势加强、利润率下降、从经济萧条中复苏的能力减弱。另一个进程是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日益增长。关于这点，马克思谈得要少得多。他设想工人们在大工厂企业中的高度集中及对工资增长的限制是这种政治意识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他没有说明工人们为什么或怎样学习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努力要传播给他们的真理。马克思理论中的这个空白，即缺乏社会心理学的情况，使得某

些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提出这样的假设：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增长将是同一种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经济过程的自发反应，这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正确。人们确实可以用马克思本质上是正确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观点，来书写1844年到1929年这一时期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对这时期的说明，远比任何其他学说要清晰。但在这个理论的结尾处，马克思主义所勾画出的这幕世界戏剧需要欧洲工人阶级作为历史变革的动力出现时，工人阶级却无声无息、无所作为。

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不仅为外部压迫者，即那些财富的拥有者和政权的统治者所支配所奴役，而且也被阻止人们求得自身解放的意识形态所支配、所奴役。这个观点对于那些以一般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待的1929年及其以后事件的人来说是切中要害的。然而，马尔库塞转向弗洛伊德以填补马克思主义所缺乏的社会心理学，看来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弗洛伊德的政治观点，无论作为市民还是作为理论家，都极其保守，据猜测，当年年轻的弗洛伊德在巴黎时，就对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感到恐惧。这种一方面是文明另一方面是民众鲜明对比，当然是法国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这种意识形态的对比由于对法国大革命、特别是对巴黎公社的恐惧而得以滋长，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它们再度出现了。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建立在生理基础上的人性本能的内驱力，受内化的双亲权威，即超我的控制和压抑，也受自我的控制和压抑，而自我则通过调节本能力量之间以及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对立要求，力图在面对现实时保持自身的完整；自我也必须在追逐快乐的内部本能和此种追逐必定会在其中受到约束和抑制的外部现实之间进行调节。但这不仅仅是个体通过抑制他的本能欲望而赢得了意识自我控制的一个领域。文明就奠基于这个抑制过程之上。只是通过禁欲主义地放弃追逐本能的快乐，力必多^①方能升华并用于创造高级文化。只有少数精英人物才能担当起这些任务，如果他们对社会秩序失去了控制，群众盲目的本能情欲将会毁灭整个文明。

因此，对弗洛伊德来说，社会理论是建立在自由与快乐和性欲与文明这两重对立之上的。自由和快乐的对立依据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婴儿期的本能欲望和此等欲望与外界相遇

① 弗洛伊德独创的心理分析术语，又译性力、意即原始情欲的能量。——译注

时所产生的固恋心理仍然在我们身上起作用，所谓解放实质上就是从对本能情欲和固恋心理的执着中解放出来。但这样的解放必须依靠自我，依靠自我对现实原则的掌握，以及自我取代本我的统治地位和自我对快乐原则的约束。

“哪里有本我，哪里就有自我”，所以快乐原则不能支配自由个体的生活。但根据我已引证过的马尔库塞的观点：自由和快乐之间的联系既是概念的又是经验的，两者关系密切，除非弗洛伊德理论能摆脱自由和快乐的对立，否则他似乎是不能运用这个学说的。

恰恰出于同样的理由，马尔库塞还须驳斥弗洛伊德著作中关于性欲和文明之间的对立的观点。马尔库塞认为，文明成果能够是，或事实上曾经是由放弃性欲所取得的。但是，一方面是性欲和快乐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是他向往的文化与自由之间的联系，两方面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他必须证明性关系并不象弗洛伊德设想的那样迥异于其他社会关系。弗洛伊德想了一些比建立在粗俗的、强制的和互不承认的性生活基础上的性伙伴关系更为广泛的社会制度。马尔库塞则试图勾画出这样一种可能的社会制度：人们的关系由于力必多的渲泄和满足而充满活力，弗洛伊德却认为这种渲泄和

满足将导致任何社会制度的毁灭。

由于马尔库塞试图断定文明史极象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样，他就必须（也确实）认为：自由和快乐、性欲和文明之间的对立都是处于人类发展特定阶段中的特定社会制度的产物，而不是人类本性的产物。他试图修正弗洛伊德的观点，提出了多余的压抑和履行原则这两个概念。

“多余的压抑”指的是一整套对于维持某种特定的社会统治形式必不可少的限制措施。他把这个原则与“基本的压抑”相区别，弗洛伊德认为，后一套原则是对本能需要的限制，为建立和维持文明所必需。马尔库塞认为，因为经济的匮乏和为克服此种匮乏而进行的必要的工作，某些基本的压抑和禁欲主义对于建造文明确实是必要的，马尔库塞对这些深信不疑。但是分配资源的形式（不管资源是否贫乏和通过工作的努力是否得到了增长），以及工作的组织形式却总是强加在人们头上的；并且，为了维护这些形式的必要的压抑形式则已超出了维持文明所必需的程度。进而，当技术和物质的进步扫除了文明发展道路上经济匮乏的障碍时，压抑对于维持文明的任务来说日益显得多余。愈来愈变为一种其目的是维持特定、可去

除的社会统治形式的多余的压抑。

对那种声称压抑之为现实性原则所必需的观点，马尔库塞驳斥道：这是把现实性原则的要求与某种特定的社会统治形式以现实的名义所伪称的要求混为一谈了。我们应在既定的社会制度和等级秩序中履行社会职责，并不是现实的命令；马尔库塞将包含在这种命令中的原则称之为履行原则。

马尔库塞用多余的压抑和履行原则这两个概念，说明人类历史可以被划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开始，社会统治对于消除经济匮乏和奠定增加物质财富所需的技术基础是必要的；但现在，性力必多能量的压抑，以及它们仅仅是在劳动和社会要求于家庭的受限制的一夫一妻制的性生活的受控制的形式中的表达，都是些不必要的压抑。人类解放要求，性欲不应再不得不在一种不能自我确认的，异己的社会形式中表达自身，它必须从荒谬的禁欲主义和自我克制中解放出来。因此，对马尔库塞来说，如果人要得到解放的话，性欲就是必须被解放的。如果性欲会得到解放的话，那么在性行为特征上会有什么区别呢？

由于马尔库塞把性力必多向生殖的和一夫一妻制的渠道发展看作是多余的压抑过程的

一部分，他至少一直将某些关于不正当的性欲形式的禁忌视为非理性的压抑手段。“同样的禁忌被加之于与文明不相容的本能的种种表现上，加之于与压抑性文明，特别是与一夫一妻制的生殖功能至上性不相容的那些性行为上”。在一种与此不同的文化中，一种自我调节的性欲将从一般来说受控于生殖的目的状态回到这样一种状态，这时，“从肉体的性感区获得快感”的目的得到了实现，全身心地投入性活动之中，并且使性本能的“活动场所和目的”成为“有机体自身的生命。”

指责马尔库塞关于性的讨论完全是夸夸其谈废话连篇，恐怕是不对的。因为他只是跟随心理分析学派的传统，使用那些陈腐的心理分析学术语。但当马尔库塞从天上的幻想步入色情文学的现实并极其不安地面对性虐待的疯狂行为时，人们禁不住要向马尔库塞发问：“在这种性解放的情况下，我们实际上该做什么呢？”

对这个问题仅仅回答说在一种性解放的情况下，人的性潜能不能预见，显然是不够的。在给出某种答案之前，一个不受压抑的、或至多是自我升华和解放的性欲概念是空洞的；更糟的是，除非与某种可能的但尚未实现的性文化进行的比较对照已经有效地勾画出来，关于

当代性欲是被一夫一妻制、生殖的性文化所束缚的概念也是空洞无内容的。马尔库塞这里的失误对他的整个论点是致命的。这种失误仍与他对经验事实缺乏兴趣有关。马尔库塞为了自己的理论需要而改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但是他显然确信弗洛伊德的情欲理论在根本上没有缺点，而且他也不想对性欲事实进行独立地探询和研究。他对对立的和不相容的理论的态度近于可耻，这丝毫不会令人奇怪。威尔姆·赖希^①比任何其他心理分析家更多地解释了何谓被解放的性欲，未被解放的和被解放的性欲之间的差别是什么。而在投身于反纳粹主义的斗争方面，赖希也比其他心理分析家更积极。因此，对以弗洛伊德、马尔库塞为一方和以赖希为另一方之间的差异，人们原可以期待马尔库塞提出一种谨慎的同情的说明，并期望他在考虑确定真理在哪一方时（如果只有一方有真理），说明何种经验证明是决定性的。马尔库塞不仅没有这样做，仅用二十一行文字就打发了他，并在最后将赖希的观点讥笑为“近年来

^① 赖希（Wilhelm Reich）（1897—1957）奥地利人，弗洛伊德的学生，30年代在柏林加入德国共产党，并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中开展政治运动；以后他的精神分析见解同弗洛伊德正统派的精神分析发生尖锐矛盾。他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综合起来。——译注

赖希的任意的和异想天开的陈词滥调，”而这仅仅因为赖希的观点与他的观点不同。

例如，赖希不同意弗洛伊德的死本能假设。马尔库塞赞同死本能的观点，却绝口不提几乎所有熟悉有关经验事实的人都与赖希一致而反对死本能。马尔库塞认为在现代技术的毁灭性中，特别是在那种“在公然蔑视一切有用之物的趋向中展露时间及其起源”的毁灭性中，可见死本能的作用。“在为攻击敌国和敌对集团的战争和为对时空及人的毁灭性征服所找到的种种合理的、美化的动机下面，爱欲的死亡伙伴（即死本能）因其受害者的认可和参与变得昭然若揭”^①关于现代战争的受害者认可和参与了对他们自己的毁灭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暂不考虑，而先来注意这段话中提出的一个问题：马尔库塞在调和他的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弗洛伊德主义时事实上有多大成就？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关心对人类行动出乎意料的后果的某些类型的解释；弗洛伊德提出无意识欲望的概念，此种无意识欲望产生的结果或者不是当事人有意向往的。也和他自觉表明及真心宣称的意图不一致。典型的例子是口误，心

^① 《爱欲与文明》1954年波士顿版，第52页。

里想要说一句表示敬意的问候，说出来的却是一句冒犯话或一句戏谑。针对别人的种种繁复的行为方式也可用相似的方法来解释。马克思就是用人们生活于其中却又视而不见的社会结构的性质来解释人们行动的自发结果的。人们产生了他们并不希望的结果，是因为他们忽视了统治着经济关系的因果规律，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整个经济制度的运转，至少在现代社会，是倚仗人们对他们的行动决策与社会大系统之间关系盲目无知的基础才得以进行的。正是经济活动的独立性导致人们把社会看作异己的力量，并使他们自己与社会相疏远。没人想要或至少不需要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毁灭性结果；毁灭的结果恰恰是一个不体现人的动机或意愿的不受控制的经济制度的产物。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前言中坚持说：他对资本主义的讨伐并不是要资本家个人承担责任。

异化概念可以扩张，并确为马克思所扩展（例如在1844年的手稿中），这个概念远远超出了经济关系的领域；无意识性欲的概念也可以扩展，并确实为弗洛伊德和许多弗洛伊德主义者所扩展，它超越了个人关系的领域而进入了经济活动的领域。乍看起来，这些解释模式是否相容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但至少有一点是

清楚的；如果我们能够从经济体系的种种活动入手（事实上我们做不到）解释现代战争的发生及其破坏性，我们就不必求助于无意识的毁灭性的本能冲动来解释这同一现象。然而也许这种现象是超决定的？或许这两种因果系列都在起作用？要提出这个问题，甚至暗示回答这个问题的困难都暴露了这两种解释模式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过于一般，以致不能作为真正的解释性概念起作用。例如，为说明现代战争的发生和特征，解释须是极其详尽的，没有一种解释会是充分的，它不能解释为什么战争发生在这里而不是那里，发生在此时而不是彼时，等等。然而根据我们正在考察的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的性质都是异化的现象，因此，求助于异化概念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对我们就没有别的说明性用途了。

同样，由于死本能被假设为是在所有的人类的破坏性行为中都起作用的，它也不能解释任何极其特殊的破坏现象，如现代战争之类现象的特定性质。此外，还有一个我们怎样不依赖于死本能的种种表现而确认死本能的存在的问题。如果我们把一物作为一物的原因的话，这

点必定是能做到的。正是这个难题，使得死本能概念不能成立。

如果异化和死本能概念用作解释目的之困难，指的是这两种概念的解释作用如何能调和的问题是多余的话，马尔库塞合用这些概念仍然会产生另一类困难。对马克思来说，社会制度的一般特征问题和个人命运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前者的解释是第一位的；对弗洛伊德来说，社会现象则应由人性的个体特征来解释。马尔库塞可以不顾弗洛伊德的个体主义的基本性质，因为他正想把一个体的发展和以往社会的历史视为完全同一。每个个体的发展简要地重现了种族的历史。这种学说的确很难理解，只能算一种构思精致，又富想象力的隐喻。例如，如果有人证明（如象人们会期待马尔库塞会做的那样），日新月异的技术在社会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个体的发展中与此相对应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显然，这样的疑难是不胜枚举的，但马尔库塞对此却视而不见。“快乐原则为实现原则所代替是种的发展（种系发生）和个体（个体发生）发展中极痛苦的事件。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这个事件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屡屡发生于整个人类历史和每个个体历史中的。从种系发生学上看，

它首先发生在原始的游牧民族中，原始部落的父辈独享权力与快乐，却强迫儿辈们自我禁欲。从个体发生学上看，它发生在婴儿期……”^①

这样，马尔库塞依据史前一些事实和婴儿期一些事实之间的相似性就得出了个体重现种系的命题。因此，马尔库塞竟会把那些史前的事件真的发生与否的问题视为无关紧要，就毫不奇怪了。他允许“假说规定的远古事件可以永远超出人类学证实的范围”^②但坚持认为这种假说具有“象征价值”。马尔库塞的这个观点似乎要表明：如果我们把弗洛伊德关于原始史实的假设看作似乎真的那样来解释后来人类历史的史实，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后者。我们如何去检验这个观点仍不清楚。可是，由于存在着前面这个观点上的困难，这个问题再次显得没有必要向他提出。

弗洛伊德关于原始游牧民族的论述，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制度起源的社会契约论的传奇。原始部落父辈独占女色之乐，并且压服儿辈。儿辈们仇恨父亲，联合起来杀了他并饱餐一顿。杀父的罪恶感又使他们团结起来，成立了一个禁止杀父和禁止自相情愿的乱伦的氏

① 《爱欲与文明》，第15页。

② 《爱欲与文明》，第60页。

族。他们不再互相争斗以继承父位，因为他们懂得这是徒劳无益的。这导致“在他们中形成一个联盟，即某种社会契约。因此，就出现了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同时放弃本能的满足，承认互相之间的义务；社会制度被宣布为神圣的，不可推翻的。简言之，自此有了道德和法律。”^①

即使我们象马尔库塞那样，把这个说明不是当作真正的历史叙述，而只当作一个也许存在的传奇，一个说明性的隐喻，此等说明也必须是内在统一的。即便是一个隐喻，若含有矛盾也就不会有效用。而弗洛伊德既不能自圆其说，又是自相矛盾的。和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一样，弗洛伊德也必须解释人们的相互关系怎样从纯粹的暴力状态，从每个人寻求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的状态，转化到有了用非个人的方式调整人的行为的社会准则和社会制度的状态。弗洛伊德实现转化的阶段也与霍布斯的说明不同；它们是罪恶感、制定禁忌、建立社会契约。然而，每一个阶段恰恰以这些社会准则和社会制度的先在及其作用为先决条件，而这些社会准则和社会制度的起源正是需要说明

① 弗洛伊德：《摩西的一神教》1955年纽约版，第129页。

的。

罪恶感是对公认的准则受到破坏的一种反应，它并不就是一种强烈的否定的情感。要使某事成为禁忌，需要已建立的制度作出安排；而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中人们实际用以表达自己的确定形式，只有个人的意志，那种制度上的安排如何能存在呢？除非承诺的制度和确保履行承诺的准则已被建立，否则契约是不可能订立的。可见，所谓的原始状态根本不是前制度、前法律的、或前道德的状态。因此，原始状态在弗洛伊德的叙述中并不能象他臆想的那样或马尔库塞要求的那样起作用。

上述麻烦使得整个论题在马尔库塞的理论形式中站不住脚。虽然马尔库塞的弗洛伊德观点不适用于人类的过去，但对说明人类未来的潜力可能还是有启发的。马尔库塞断言：正是在幻想中，例如在戏剧、梦和白日梦中，保留了我们快乐原则的执迷；而且正是在充满想象力的作品中，找到了极明显的我们被“压抑了的情欲的复归”和对人类新的生活方式的期待。在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中，我们的情欲将得到转化，力必多也将使一切人的和劳动的关系充满活跃的生机。这些关系不再是统治关系，因此多余的压抑将会结束。但是这种社会关系将

是怎样的呢？它们与现存的社会关系如何区别呢？仅用不甚清楚的力必多概念及不再存在统治关系的设想，不足以刻画这种社会关系的特点。马尔库塞把这种社会关系与人们在其中自由地自我实现的社会条件视为一回事，但他也允许人们仍可以有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满足方式，并且还会有冲突。为什么这些冲突不会导致新的统治形式？对此马尔库塞保持沉默，也许正因为他的理论事实上是极其空洞的。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在《爱欲与文明》中又出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论点。用人与其性欲的异化来解释人类文明，把爱欲看作是人类事物的中心，以及关于遭遇并理解并包容爱欲于其中的异化形式等等。这种思想实质上是费尔巴哈的观点。在马克思的一些早期著作中，如象《哲学的贫困》中的一段话，就可以发现费尔巴哈观点的痕迹。但马克思继黑格尔之后把异化与劳动联系起来，改变了他的费尔巴哈观点（费尔巴哈预见弗洛伊德的观点）。马尔库塞在复兴这些观点时再三表白：他不是一个后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这个说法应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受到最严格的检验；在此书中，马尔库塞运用马

克思主义的观点比他别的著作更明确也更详尽。因此现在我将进而考察，马尔库塞是否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专门作品中，也清除掉了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观点。

第五章 《苏联马克思主义》

马尔库塞在1952—1953年和1955—1956年期间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必然是对斯大林主义并且紧接着是对后期斯大林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种研究具有他关于西方社会主义的研究著作的同样的缺点：这本著作令人奇怪地几乎没有关于俄国的实际事例。但是它与在它之前的《爱欲与文明》毕竟不同，也与紧接在它之后的《单向度的人》不同，它主要研究一种学说，而不是一种社会。《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导言中有一些关于他的研究方法的晦涩的、但也是重要的意见。马尔库塞明确否定对历史作目的论解释的黑格尔式的洞察力。然而，在他否定这一点时，他与黑格尔的联系究竟有多少被他否定了呢？在《爱欲与文明》

中，马尔库塞曾再次把黑格尔的思想视为西方哲学的顶峰。在黑格尔那里达于顶点的西方哲学的传统，按照马尔库塞的解释，是一个理性树立标准的传统，经验实在要想变得合理化，就必须遵循理性的标准。黑格尔设想：不仅事实上经验实在在历史的行程中越来越符合理性的要求，而且由于历史过程实际上是理念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被理性所指示的过程，经验实在最终必定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理性的这些要求。但马克思却认为：正是这种目的论使得黑格尔歪曲了现代历史，马克思还认为使现实合理化的任务现在已变成了实践的和可能的任务。在工业化的基础上，人们——确切地说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是人类中仅存的，不为现存的制度和过去的历史所束缚的阶级——能够而且必须按照实践理性的要求，重建社会制度。

50年代前期，苏联官方声称苏联的这种重建社会工作三十多年来一直在顺利向前发展。马尔库塞对此的批评依据这样一个正确的看法，他认为在苏联所发生的事，并不是社会现实日益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要求相一致，而是使苏联马克思主义日益适应苏联现实的需要。更有甚者：苏联马克思主义已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得以被理解的整个结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公

式现在不是被用来表述真理，而是被用来指导信徒的实践。“正因如此，他们对献身真理不再有热情，而更热衷于维持现存秩序和宣传标榜自己：他们的‘真理’就在于他们行动的效果”^①马尔库塞用了诸如实用主义的、咒语式的、魔术式的等不同名词来刻画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我们必然地把这个整个实践模式看作不合理的，但是“从体系外部来衡量的不合理的东西，在体系内部却是合理的。”^②因而，马尔库塞有两个任务：重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然后对它背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批判。我们可以用四个重要例子来考察他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斯大林主义的美学坚持认为：文学和绘画艺术应该用自然主义方法来描绘苏联的现实，即用乐观主义的观点进行观察。对苏联以外世界的现实同样要用自然主义的方法，但却应该用悲观主义的观点来观察。艺术必须是自然主义的，因为它的功用是按事实的本来面目描绘它。马尔库塞把苏联的这个观点与黑格尔的观点作了对照，后者认为艺术属于这样一个阶段，在这期间理念和现实之间有很大差异：因

① 《苏联马克思主义》1958年纽约版，第88页。

② 同上书，第86页。

此作为理念表现的艺术，本质上是非自然主义的；黑格尔似乎认为：理念的实现事实上将使艺术失去作用。苏联马克思主义则声称理念正在苏联被实现，进而使艺术去除了其为黑格尔——还有马尔库塞——确信所具有的功能。苏联美学家“要的是不成其为艺术的‘艺术’，而是一种官方要什么，艺术就给什么的‘艺术’。”马尔库塞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国家对艺术的指导，而在于使这种指导得以实行的那种理论。但他的讨论最令人惊讶之处是缺乏社会的具体分析。例如，他从来不考虑学院派的自然主义是一个曾在其他时代和地点出现的学说，例如在闻名于世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这是一个在技术上蒸蒸日上的、性关系上却是保守的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由于马尔库塞坚持用自己的概念判断苏联社会，把自己限制在他称作为：“紧迫的批判”中，这样他的视野就极其狭窄。

在论及苏联关于苏维埃国家的学说时，马尔库塞强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不属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属于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基础决定国家的形式，而国家不能控制经济的变化。但根据斯大林主义的学说，国家现在已变成了指挥

和控制经济变化的力量。只要苏维埃国家面临着国外和国内的敌人，国家的力量就不会消亡。但是那些管理国家并分享国家权力的人们，即官僚，并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赋予他们有别于全体苏联人民利益的长期利益。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学说就是这样。与此相反，马尔库塞断言：官僚政治已发展出了引起分裂的特殊利益。他的依据是下列判断：“不管官僚政治多么庞大，它本身并不产生使自己永恒存在的力量，除非它拥有能从中产生出其地位的经济基础，或者除非它与其他具有这样一种权力基础的社会集团结成联盟。”然后他认为：苏维埃官僚通过对国有化经济的控制，确实拥有这样一个权力基础，但不幸的是，他没有提出理由，使我们接受他这第一个判断。

此处，问题的要害是什么？比如说一个可供选择的假设可能是，官僚政治首先获得了一种特殊利益。并且产生了一种自我永存的力量，这种力量并不具有特殊的，在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的利益的特征；但是，然后它就可能进而获得这种经济利益。在这两种对立的假设中作出决择的关键问题，当然是苏联官僚政治发展的历史事实。但马尔库塞从不把他的概括放到历史中去验证，也没有任何其他事实的验证。他宁可用他自

己的马克思主义一般概论来解释苏维埃历史。

无论如何，对马尔库塞来说，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很难应用他的研究方法的一个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并未专门论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细节，及其在转变期间将怎样行使国家权力的问题。马尔库塞却认为：因为斯大林不能理解这种转变的基本特征，所以就整个地歪曲了马克思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他的这个责难立足于他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视辩证法规律为一种高级的因果概括，此种概括支配一切变化，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由此而来的结论就是：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也是受规律支配的。然而，如同我已指出的那样，马尔库塞正是要否定这一点。对斯大林主义来说，从必然向自由的过渡本身就是受规律支配的，对马尔库塞则并非如此。这里就不必重复讨论本书第三章马尔库塞关于此问题的观点上的讨论了。但是，我们的确应该注意的是：如果马克思主义在此问题上会改变观点的话，那么，在恩格斯《反杜林论》中论及此问题时就会这样做了，我们也早就可以读到他为马克思写了些什么了。当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哲学家1955年写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客观规律”时，这位哲学

家在歪曲马克思的思想这一点还是不明确的。马尔库塞引用的这句话为M·T伊涅切克^①所说，马尔库塞在这句话下划了加重号。这句话后面紧接着这样一句断言：这种客观规律是“独立于人的意志和意识而运行着的”，这话难道也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马尔库塞承认：恩格斯和斯大林在辩证法观点上实质是一致的。如果他认为甚至连恩格斯也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话，他不是应该提供一些证据，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问题上的不一致吗？或者说甚至马克思在这里也歪曲了马克思主义？

我们已经^②有理由相信，马尔库塞用黑格尔、马克思及其他哲学家的只言片语构成了一个新的杂拌，他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称它为“马克思主义”。这就好象当老马克思说——象他过去说过的那样——“至少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时，他在反驳说：“你的确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我是”。马尔库塞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现实关系的整个论述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当马尔库塞讨伐苏联马克思主义与他所持的马

^① M·T伊涅切克 (M·Tlovchuk) (1908—)
1936—1938年任莫斯科化工技术学院门德列夫辩证唯物
主义研究所所长，1957—1970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
所所长。——译注

克思主义的相异之处时，他是设想不用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历史的消极面加以解释。马克思主义于是作为一种纯粹的、未受污染的理论，继续提供一种裁决苏联现实的标准。这样一来马尔库塞对苏联的说明就与另一些人的观点正相反，他们认为苏联现实的所有罪恶正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也与那些把从马克思经过列宁到斯大林的过渡视作是一个完全连贯的发展过程的人正相对立。但是，如果后一种观点显然是荒谬的话（马克思一生都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相信，资产阶级议会制自由的弊端就在于实际享受自由的只限于少数人），也就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可脱离其历史命运加以评价的理论。这样做在任何情况下只会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发生之际，支撑着不同社会制度的种种社会关系，也将得以改造，对此点马尔库塞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者都表示赞同。现在，可以用迄今为止所不可能有的方法去指导社会变革了，而且，这还意味着即使苏联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国家作用的观点是奉旨而发，但认为非个人的经济力量已丧失其在历史因果链中的统治地位，却是马克思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共同的观

点。由此得出的结论便是：象先前那样，将人类社会活动类型划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析方法就不再适用于这个社会形态的更替时期了。结果之一可能是那些进行社会变革的人们——工人阶级和他们的政治代表——将能够客观地思考社会，并从存在至今的阶级社会的虚假意识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他们将挣脱意识形态的变形物。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实际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是关于这个过渡时期的理论了，因为事实上作为过渡时期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也附属于马尔库塞所说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变形物。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学会把它的方法转而运用到自己身上。由于任何理论都产生于特殊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中，因此，每一种理论都标有从属于它的特殊性质。如果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是正确的，它自身也必然标有此等特殊性质。卢卡奇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中经济（此为基础）和政治（此为上层建筑）的区分，导源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经济和政治的分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不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转；但他的观点还是可以进一步发挥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因其在社会制度中的

意识形态功能而能表现其历史的任何理论，只有通过某些从外部把握其原始理论的学说才能被理解，这种理论是能够被置于自身的历史联系中的，因此它也就能作为相对的事物来看，它的某些面貌在历史进程中必然要变形、扭曲。根据马尔库塞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也能展示出这样的历史。因此，现在也必须从外部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必然被歪曲、并正在变形的理论。用任何其他方法去考察马克思主义都将与马克思主义自身不一致：我们尤其不能在马克思主义经历了这一切盛衰变迁后，还根据某些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判断和理解它，以为这种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还真的存在。结论就是，在今天，要忠于马克思主义，我们就必须不当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无论谁只要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就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

进一步的推论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者——不管人们认为自己怎样。但如果马尔库塞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他运用理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他到底是什么主义者？答案已经有了。用理想化的理论去评判现实的不完善正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中心观点，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一书中，结果是老调重谈，青年黑格尔派再次复活。

第六章 《单向度的人》 对当代社会的批判

《单向度的人》标志着马尔库塞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巨大突破。虽然，他关于西方工业社会的主要论点已见之于《爱欲与文明》，关于苏联社会的主要论点则已见之于《苏联马克思主义》。新观点有两点：他事实上不再使用任何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的（用来反对黑格尔的）范畴，以及他的悲观主义。在《理性和革命》中，马尔库塞批评黑格尔最后陷入了悲观主义，因为黑格尔满怀忧虑地期待1831年英国议会选举改革中他所预料的种种发展。马尔库塞指出“黑格尔哲学在疑虑和顺从中告终”。没有人会责备马尔库塞顺从，但在1960年他为《理性和革命》第三版写的序言中，当他讲到“一种精神的能力即否定思维的能力正处在被

湮没的危险中”时，至少是表达了疑虑情绪。根据马尔库塞的观点，由于否定思维是创造性的社会批判的唯一源泉，他的确担心社会生活中的创造性被湮没。这种恐惧成了《单向度的人》的主题。

《单向度的人》一书的观点之古怪堪称前所未有。因为如果此书的论点正确，我们就必须了解它的成书过程以及此书是否能有读者。或者说，我们必须确定此书的确拥有读者，但这样一来马尔库塞的论点也就不能成立了。因为马尔库塞的论点是“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系统的技术进步，创造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和权力形式），它要调和种种反对此系统的势力，挫败或拒绝以自由的历史性前景的名义对苦役和统治进行的所有反抗”。甚至思维屈从于社会现实到了不再能对社会生活提出任何批评的地步。如果社会出于维持现状而进行的控制真是那么强大，马尔库塞的著作又是怎样挣脱这种控制而得以出版呢？

马尔库塞的答案在此书的导言中。他认为在社会中存在着与他书中所描述的趋向相反的力量和趋势。他断言《单向度的人》就是论述这些相反的力量和趋势的；但直到此书的倒数第二页才出现对这些力量和趋势的论述，在这

之前只有一两段话提到它们，并且，看不到有什么远大的希望与此等势力的前途联在一起。马尔库塞的悲观主义只是得到了一些极为散见的例证和呼吁的支持，这一情况类似于在此书之前的他谈论乐观主义时的情形，但不同于此书后的新质的乐观主义。（《单向度的人》第一次出版于1964年）他指出，他的观点的“最有力的证据”完全可以从看电视或连续几天每天听一小时的立体声音乐中得到，并且提到了从国会诸委员到万斯·帕克德这样一群撰稿人的名字。但是，他不打算在严格的意义上运用这些例证；也许这并不奇怪。因为在1960年为《理性和革命》写的序言中，马尔库塞就谈到过他所谓的“既定事实的力量”，他认为“这是一种压迫的力量”。但既定事实仍必须正确地被描述，马尔库塞这样做了没有呢？

《单向度的人》的基本论点是：先进工业社会的技术，通过使在先前社会制度中观点相异、利益冲突的所有人的同一化，而能够得以消除冲突。技术部分地是通过创造财富而做到这点。马克思和马尔库塞都认为，物质需要上的自由是取得其他自由的先决条件，但现在它已变成一种产生奴役的力量：当人们的需要被满足时，他们的批判反抗的理性就被消解了，

他们变成了统治阶级的消极工具。有人认为只要满足了人的需要，我们能够对他们加以控制，对此种观点的明显的自相矛盾，马尔库塞决非毫无察觉。他试图在虚假的需要和真实的需要之间作出区分。虚假的需要是“那些特殊的社会利益集团为了压制个人而加之于个人之上的需要”^①。将虚假的需要完全等同于控制个人的需要，这个定义是有问题的，但马尔库塞想说的意思却很清楚是这样的。迄今为止，个人对物质产品的需求是以牺牲他和别人对自由的需要及其他诸如此类的需要为代价才得到满足的，前者就是马尔库塞所称的虚假的需要。马尔库塞认为个人并不必然是他们自身真实需要的主宰者。“归根到底，关于什么是真实的和虚假的需求的问题必须由个人自己来回答，但这仅仅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的：这就是说，仅仅在如果而且当他们是自由地给出他们自己的回答的时候”。只要他们生活在一个像我们的社会一样的社会中，他们就不是自由的。针对这个问题我紧接着就要问：马尔库塞怎样获得了谈论别人真实需求的权利？他如何逃脱影响其他人的那种思想灌输？关键不是责

① 《单向度的人》1954年波士顿版，第5页。

备马尔库塞狂妄自大，而是要强调他的观点必然导致高人一等的结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认为：那种视人为环境所塑造，并需要由新环境再加以塑造的学说，把人分成了两部分：塑造者和被塑造者^①。马尔库塞再一次复活了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尔库塞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作为一种明确的学说，将在他的著作中重新出现，但在这里，已成为《单向度的人》预先内含的因素。

富裕的社会消费方式具有双重结果：既满足了那种可能导致反抗的物质需要；也促进了与现存制度的同一。“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欣赏同样的电视节目并去同样的旅游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和他的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迷人，如果黑人拥有一辆凯迪拉克牌汽车，如果他们都读同样的报纸，那么这种同化指的不是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那些为保存现存制度之用的需要和满足，也被底层民众所共享的程度。”^② 消费方式对大众的影响，不是宣传工具创造出来的，但确为后者所加强。

而且，一个先进的工业社会的工作条件也

①：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译注

② 《单向度的人》，第8页。

趋向于使工人们变得消极。一个半自动工厂中的生产节奏、熟练工作的性质、白领工人比例的增加等等，这一切都摧毁了任何反抗现存工作制度的意识。首先就是摧毁了任何反对福利国家的意识，这种国家依靠颁布通行生活标准的方法支配了其受益者的生活。这是因为，提高消费欲求，必然要削弱任何要求自立的冲动。

在这里，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马尔库塞在早期著作中曾竭力主张的自由的条件与快乐条件的一致性的论点。但马尔库塞现在似乎说：人们不再想要自由了，因为福利国家和富裕社会已经使他们得到幸福了。这样，他是否是从他早先的观点后退了呢？一点没有。因为，虽然马尔库塞确实讲到个人存在“满足于政府提供商品和社会服务所带来的那点快乐，”但他清楚地指出、这种快乐不是真快乐。现代社会的闲遐不是自由，因为闲遐“在先进的工业社会比比皆是，但从它仍被商业和政治所支配来看，仍然是不自由。”^①而且，现代社会的宽容也是一种支配手段。在此以前的社会制度中，性欲的升华（sublimation）是压抑。正统的弗

① 《单向度的人》，第49页。

洛伊德理论认为非升华 (desublimation) 只有在压抑终结和压抑减少时才会产生。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提出了对弗洛伊德主义的修改，主要是为了说明不以压抑为基础的文化的可行性；可是，现在他借用那本书的观点，是认为非升华已在我们的社会中出现，但这种非升华的发生形式仍象以前的升华一样是压抑。由于力必多的发泄受到如此严重的控制，以致性欲充斥于社会生活的表面——例如充斥于无数的广告宣传中——并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但这并没有回复到情欲的正当的满足方式。

最后这个论点马尔库塞是有独创性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尔库塞认为是现状辩护士的那些人的观点，却也大量地为他所持有。例如，他赞同雷蒙·阿隆的观点^①把所有先进的工业社会看作基本上是相同的。这点在马尔库塞讨论苏联问题时尤为明显；他认为苏联的发展趋势与他所讨论的西方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看来，这个学说依靠的是相当粗糙的技术决定论。他很少或几乎不提特殊的民族传统或文化影响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在他讨论第三世

① 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 1905—)，法国历史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译注

界发展独立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可能性时，他的悲观主义来源于他坚信：不发达国家要发展的正是先进国家的技术，这种技术是这些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的产生根源。

同样，当马尔库塞谈到冲突已经基本上被消灭时，他重复了丹尼尔·贝尔^①在《意识形态的终结》和S.M.利浦塞特在《政治的人》中所举的部分例子。马尔库塞象贝尔和利浦塞特一样，认为消费和劳动力结构以及福利国家制度的变化，已驯化了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并因此使得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对立理论不再适用于现代化社会。一方是马尔库塞，另一方是利浦塞特及贝尔，似乎都在展望劳工运动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的结束或起码是根本性的缓和将导致意识形态斗争的终结。因此，意识形态终结的学说就为马尔库塞悄悄地出人意外地接受了。

马尔库塞与这些作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他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的看法上。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也与他们有相类似之处，因为马尔库塞也是同他们一样，从某种利益多元、但意见一致的情形出发的。“发达工业社会确

①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美国社会学家，著有《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等著作。——译注

实是一个各种力量相互补偿的系统。但这些力量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中互相抵销了。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和捍卫并扩展既得的地位而与历史的抉择较量，以求控制历史的变化”。这种共同利益由于外部敌对的意识形态的幽灵存在而得到加强。西方和共产主义国家都利用外部的内部的威胁推行集权主义统治。认为在议会民主中的政府是由互相竞争的精英人物操纵的，这正是正统政治学的套话；马尔库塞对这种分析也许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异议，但他会认为：这些精英人物只有为了这种近乎全盘控制的系统的利益，才能行使权力。

在1934年的著作中，马尔库塞认为自由主义会使极权主义成为它的天然后继者。在1960年的著作中，他把流行于发达国家中的社会制度作为这种极权主义的具体表现，因而他准备用同样的术语来刻画希特勒德国和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的美国——至少，他认为在美国存在着一种强大而且日益增长的趋势，在其主要方面与纳粹主义相似。但当今的极权主义不是表现在政治的专制上，而是首先表现为要消灭包含着颠覆和改变现状的思想的文化。用马尔库塞的观点来说，艺术已失去了它的传统的功能，“现在几乎每个人的手指尖都能有出色

的艺术作品，只要他转动电视机旋钮、或走进杂货店就行，这点是好事。然而在这种扩散中，人们变成了复制艺术品的文化机器上的齿轮。”^① 马尔库塞把这种情况看作是文化的平庸化，是将双向度的人变换为单向度的人。这就是此书书名的由来。不仅仅是在艺术和文学著作中才发现了这种单向度的性质，语言自身也堕落了，在广告中、在通栏标题中、在草率、低劣的新闻文体中、在缩写语中，首先在一种文体中堕落了，具有这种文体的语言阻止一切反思的和批判现实的思想。所以语言也和力必多、福利、工作一起成了极权统治的一种力量。

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单向度的人》确实把马尔库塞由一个主要以黑格尔哲学解释者的身份为人所知的学者变为了一个被某些左翼分子奉为精神上的守护神式的有国际影响的人物。很清楚，许多大学生都极其认真地看待马尔库塞对于当代社会的描绘。因此，如果认为马尔库塞关于当代社会的刻画完全是无根据的，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他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但是我仍然认为他的刻画大部分是不可靠的，他用来研究当代社会的那些概

① 《单向度的人》，第65页。

念在当时就是不清楚的，现在仍是一片混乱。

在把纳粹德国与今日的北美和大不列颠社会相提并论时，马尔库塞唯一能含含糊糊地坚持的是：在这些国家中，存在着数量虽小、但确实确实存在的新法西斯主义右派的威胁。由于他对“极权主义者”一词的特别用法，结果就象共产国际用社会法西斯主义一词指称20世纪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早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一样，致命地混淆了英美国家和纳粹国家的本质区别（这里，“致命地”一词并不是隐喻性的），前者既不同于社会民主党，也不同于纳粹党。对马尔库塞来说，自由的社会制度是早期的极权主义制度。事实上自由制度及其实践，例如工会、大学、言论自由等必须完全被作为任何合理的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来捍卫。当我开始检查马尔库塞的宽容理论时，我将考察言论自由的实际问题。但十分清楚，马尔库塞的整个福利国家的理论是建立在对自由社会过去的历史和现存的结构误解之上的。

如果没有持续的斗争，特别是没有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福利制度不能成为现实，而且只有在持续的压力下，才能维持其存在。福利制度的不断腐蚀、贫困的持续产生是现代工业社会真相的一部分，马尔库塞对此却从未提过。

这不只是福利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例如，在大不列颠，福利国家的到来意味着人权观念和社会责任概念的变化：在英国，过去十年中对福利的各方面的损害，特别是对在工党政府下大量失业的新的宽容，一直都伴随着那些观念的削弱。关于统治阶级的精英人物现在能够把福利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的观点最多也只说出了部分真理，而且由于它分散人们对福利问题的注意力，又是十分有害的观点。

对性问题的宽容也是一个远比马尔库塞设想的要更为模棱两可的问题。这种宽容一点也不象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对实际的性行为 and 性态度有很大影响，更不用说对其他问题的影响了。对这种宽容的异常关心是部分知识分子的特征，这一部分人因为拥有大众传播媒介，很善于过分地加深我们的印象。确实无可争议的是，我们没有关于性态度的变化对政治和社会态度产生巨大影响的有力论据。当然，马尔库塞对此问题所作的论断，可能是真实的；但对此断言他的确缺乏充足的理由。

我们反对马尔库塞关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思想这个事实，并不等于我们也反对他的各个孤立的论点。我们有充足的根据反驳他关于这类社会的总概念。首先，我们可对他与阿隆和其

他许多人共有的关于发达工业社会基本上都是同一性质的观点提出疑问。马尔库塞相信这点，部分地是由于他从他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继承得来的信念：技术是此类社会的最终动因。还因为他把这类社会看作内部同质的社会，所以，独立的社会因素可能在其中产生影响的领域就急剧地消失了，并且还在日益消失。马尔库塞持有一种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网络观，根据这种系统观点，社会的各子系统是为大系统的利益所决定的。他显然将这种社会视为人类历史中具有最高统一性的社会。但这观点却正是最可疑的。

十分清楚，技术的进步和对技术进步的投资，是发达工业社会借以巩固其尚不稳定的现状的持续扩张的主要动力。这种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社会制度的每个部分。但每个部分受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扩张的速率和扩张的方向也是极不相同的。结果就不象马尔库塞所刻画的那样是紧密结合和协调一致的系统，而是在不同的社会系统之间合作协调关系日益减少。马尔库塞的追随者经常谈到，高等教育体系具有造就和培养经济所需人才的功能，没有比这更背离事实真相的了。在每个发达的工业社会中、高等教育得到扩展，工作结构扩大并

发生变化；但教育和经济的联系不是加强而是削弱了，因为两种扩展完全没有立足于任何确定的关系。

许多人所具有的软弱无力的感觉并不是错觉，他们确是软弱的。但他们也不软弱，因为统治他们的是一个组织完善的社会控制系统。而在这社会制度的中心却缺乏控制，中央政府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这种软弱。计划的思想、中央权力有效性的思想，恰好是在计划必定是无效率的（除去在极小的范围内）的历史时期占据了统治地位。我们这时代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政治事实，是政府被迫接受的大多数政策所具有的偶然性质。这种偶然性质是由种种无法控制的事件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虽然那些当权者坚持认为这些事件是为计划思想^①所支配，事实上却是他们主观意愿的产物。

政治的偶然性的典型例证是越南战争。美国帝国主义在越南的神话是这场战争最严厉的批评者和最坚决的支持者相结合的产物。事实上，美国是通过一系列权宜之计和应急措施而卷入越南战争的，由此造成的越发严重的后果

① “思想”一词在这里使用的是ideology这个单词，具有“意识形态”的含义，因此也可理解有“计划的空想”的意思在内。——译注

是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未曾预料到的：然后，他们就全力支持他们所做的一切，并最终发动一场对参战双方都是毁灭性的，都不能获得任何好处的战争。然而越南战争最严厉的批评者把这非人道的结果看作是一些恶人的蓄意所为，而越战最坚定的辩护者如迪安·腊斯克和沃尔特·W·罗斯托，却坚持要给出一种合理的证明：意在~~对越战的动机~~提供一种并不存在的思路。如果腊斯克和罗斯托是正确的，越战批评者的意见也将是正确的。但是，两方面的意见却带着一种固定的框架，这种框架要求社会生活具有前后一致性，实际上这种一致性是不存在的。

正因为发达工业社会是不连续的和不和谐的，非技术的因素可以发挥重要的动因作用。政治传统，文化制度，决策行为都可能不期然而然地产生比在过去较统一的社会中更大得多的影响，这些因素可能引导不同的发达工业社会朝不同方向变化。J·B伯里认为克娄巴特拉^①鼻

① 克娄巴特拉 (cleopatra)历史上和戏剧中著名人物，埃及托勒密王朝12世王之次女，传说有倾国倾城之容貌，她的美丽征服了罗马历史上的两位英雄，恺撒和安东尼，她在恺撒的帮助下，当上了埃及女王。英文中把克娄巴特拉作为绝代佳人的同义语。故有“克娄巴特拉的鼻子若是短一些，整个世界的容貌会不同”

升的长度是创建罗马帝国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我们现在仍生活在一个克娄巴特拉的鼻子的时代，相对小的原因可能产生相对大的后果。

此外，马尔库塞十分错误地假定：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多数人缺乏变革的意愿。其实说这样的社会只产生他们能够满足的需求和欲望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些社会持续地产生他们不能满足的欲望，那些统治者作出他们无法兑现的诺言，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的欲求在持续地变化，部分地也因为政府缺乏控制事件的能力。大众教育的全过程综合了这些特征，正因如此而潜在地具有破坏性。当然，对此的醒悟可能出现创造性的结果，也可能出现破坏性的结果。至于哪一种结果会出现，制约这些结果的因素是什么？我将在下面进行讨论。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的论点，当然超出了关于社会制度的问题。他也认为，现今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流行的哲学，均已被它的信奉者和非批评的特点所败坏。由于马尔库塞关于他自己哲学和新见解主要建立在试图反驳这种哲学选择的基础之上，他的意见就应该受到较为详细的考查。

一 说，意指偶然性对历史的重大影响。——译注

第七章 《单向度的人》： 对现代哲学的批判

马尔库塞对现代哲学的批判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哲学的；另一部分是社会学的。他的社会学的批判认为：现今的哲学具有使人不能合理地批判社会环境的作用。他谈到有助于“使精神活动与社会现实中的种种事物协调一致”的哲学，并谈到了他称之为“语言分析”的哲学（维特根斯坦、赖尔、奥斯汀），认为这种哲学具有一种“内在的意识形态特征。”但这种观点不能避开马尔库塞哲学的特征孤立地加以讨论。我试图表明，如果当代哲学并不具有马尔库塞归之于它的那些特征，并且由这些特征进而归之于它的那些保守的社会学的功能，那么，马尔库塞的社会学批判也必然是无效的。

首先，马尔库塞关于哲学的观点的一些次要特征是值得注意的。其中之一是他为了褒贬的目的，把迥然不同的思想家放在同一个标签下归并的方法。这不仅在他论述当代哲学时是这样，而且在他讨论“古典哲学”时也是这样；为了谴责现代哲学他拿它与古典哲学相对照。因此，马尔库塞会问：“在古典概念上，谁是理解真理与虚假的本体论条件的主体？”唯一明确提到的回答是柏拉图的《美诺篇》中的一段话，其论点是：“在古典概念中，能够达到真理的唯有哲学王（philosopher-states-man），而不是那些为获得生活必需品而终生劳顿的人，”但“如果人们不再把他们的生命消耗在生活必需品领域内，真理和真实的人的存在将在严格的和真正的意义上成为普遍的。哲学设想了人的平等，但同时，它也使平等事实上受到否定。”^①如果柏拉图的“哲学”即如其所指——如果哲学王的提法和《美诺篇》中的思想支持这种论点——马尔库塞的命题显然就是不能成立的。柏拉图从未设想过人的平等，他并不认为因为多数人必须把生命花费在获得生活必需品上，他们就难以

① 《单向度的人》，第129页。

达到真理；柏拉图确信：某些人生来就不能达到真理。很难否认这样一个结论，马尔库塞实际上缩减了“古典哲学”的意识形态内容，以便引出他所需要的与当代哲学对比的观点。

马尔库塞对当代哲学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当代哲学对形式逻辑的使用；当代哲学对语言、首先是在日常语言上的偏见；当代哲学中的科学哲学。马尔库塞对逻辑的论述发展了霍克海默尔与阿多尔诺的观点：“推论逻辑所产生的一般概念在统治的现实中有其基础。”^① 马尔库塞认为，逻辑在其内容方面的中立性，逻辑凭借形式对各种陈述和论点进行辨别和区分这一事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现实的歪曲。“这种一般的性质（量的性质）是规律和秩序的先决条件——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社会中——代价是普遍控制。”^② 人类历史上必有一个时期，在那时，逻辑作为一种控制的手段，不但要采用，而且不得不采用。“为了进行普遍的控制和计算，精神的和物质的手段发展起来了，形式逻辑的观念本身就是这过程

① M·霍克海默尔、T·W·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1947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5页。

② 《单向度的人》，第136页。

中的一个历史事件。”^①

因此，马尔库塞关于逻辑的论述根据着两个紧密相连的观点：其一，在人类历史中曾有这样一个时期，那时思想服从于逻辑规则并为逻辑规则所组织，其二，我们可以把先于此种服从和组织的思想与隶属于这种控制的思想相对照。这两个观点都是错误的。

形式逻辑作为一门学科，当然是在思想史上的某个时期被发现的。但人们在亚里士多德以前就用三段论法推论了，而且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如果他们想要思维的话，就没有其他选择。逻辑所做的是将那些已包含在实际讲话中的规则加以连接并使之明确无歧义，由逻辑来表现的规则使得人们得出有效的论点，也能避免前后矛盾所产生的困难。有效论点的建立以及有效和无效论点之间的区分，不仅对理智的探求是重要的，而且在日常语言中作为逻辑连接词起作用的所有那些词的用法也有效。概念为前提，不仅“因为”、“因而”、“意指”、“如果……那么……”以及另外一些多少明显的逻辑词语，而且“和”“或”“但是”等等都是以有效性概念为前提的。如果一个人懂得“詹姆士回家了”和“约翰看电影去了”的意思，

^① 《单向度的人》，第137页。

但不理解要么詹姆士回了家，要么约翰去了影院；以及詹姆士的确没回家，因此事实上只有约翰去了影院这些命题是不是真的，那么他是不懂“如果……那么……”或“要么……要么”或“不”等词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对诸如“不”“或”这样一些如此基本的词的理解，也是以对一定的逻辑规则的理解和利用能力为先决条件的。

而且，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将遇到一些致命的困难，不仅涉及论证的可能性，从而也与推理的可能性有关，而且还涉及言语本身的可能性。因为如果要保持思想的一致并避免矛盾，符合逻辑的规则是必要的。马尔库塞将“矛盾是不正确思维造成的错误”这个命题看作是形式逻辑的某种特殊的学说。我们对矛盾的性质及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了如指掌，这一点应归功于形式逻辑学家也许是对的。但如果亚里士多德从未建立这门学科并且如果他没有后继者的话，矛盾仍然会象原来那样存在着，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仍将存在。这些不利后果是什么？首先，某人先是断定某物如何，随后就会立刻否定他刚才所言者，他也可能告诉我们他不曾改变看法，他成功地什么也没有肯定。肯定和否定互相抵销，这样的抵销

必然是同时肯定和否定某物的结果。但这还不是全部。邓斯·司各特的一个学生证明（刘易斯继他之后也证明了），如果不使用形式演算，那末从矛盾中，确实可以得出任何一种陈述。其结果是：要我们致力于肯定一个矛盾，就是要我们致力于肯定任何事物，去肯定每一件可能被肯定，当然也可能被否定的事物。这样，肯定一个矛盾的人就既可以成功地否定一切，也可以成功地肯定一切；认为这是某者又不是某者，两种说法都没有肯定任何确定的东西。因此，我们完全是为了说话才将我们的能力建立在利用逻辑规则并符合逻辑规则的基础上，而且，形式逻辑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我们澄清我们一直在讲的话的内容。

这里包含了马尔库塞逻辑观点的错误。因为与逻辑规则一致和不一致的思想之间的差别被抹掉了。与逻辑规则不一致的思想在表述自身时将会没有一致的言语，不可能有或不曾有过——因而事实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思想。而且，在思想史上也不曾有任何时候，思想服

① C·I·刘易斯（C. I. Lewis），当代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杜威之后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概念的实用主义”（Conceptual pragmatism）的创立者。
——译注

从于和隶属于形式逻辑的控制，或为形式逻辑所组织。控制的比喻整个说来就不正确，因为它的说服力依据于尚未由逻辑规则统一起来来的思想和涵有逻辑规则的思想这两者的比较；这样前者的论点显然是错误的。马尔库塞对他所批判的那些观点的傲慢轻蔑，并不影响我们将我已展示的那些观点看作非常基本的观点，这些观点对每一个逻辑知识极少的学生也是很熟悉的。人们因而有理由产生怀疑：不仅马尔库塞，而且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尔实际上也不懂任何逻辑，可以断定，如果他们懂得的话，三个人都会尽力隐瞒他们正公开对之批评的逻辑学知识。

马尔库塞关于古代和现代逻辑间的差异的观点又对上述怀疑有所加强，他象中世纪逻辑学家那样，显得不知道斯多噶学派已预言了现代逻辑的最重要部分（以上我已举了一个例子），不知道亚里士多德逻辑能够被设计为一个更广泛的体系的一部分。^①马尔库塞说：“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的贫乏是经常被提到的。哲学思想是与这种逻辑并排地、甚至外在地发展着的。”但这种谴责是在形式逻辑已经退化或

① 简·卢卡西维茨：《亚里士多德三段论》，1957年纽约版。

消失的时期进行的。当霍布斯或笛卡儿主义者及洛克作出这种谴责时，他们能这样做，仅仅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种陈旧的传统，靠祈求亚里士多德来证明常常是非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学说。

然而，马尔库塞对形式逻辑贫乏的指责，或许不是针对那些本来能够而且应该取得成就但却毫无建树的逻辑学家，而是根据了一种关于逻辑是什么、能够成就什么的错误的理解。逻辑不是一套用来发现的规则，它不是启发式的。这里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证明这一点：尽管我们可以利用某些归纳出来的规则、大体上并有准备地指导我们解决某些问题，但在根本上却不存在用来作出发现的规则。即使是最谨慎地依靠这种规则来解决问题，也可能会使一个人完全为新的问题所挫败；一种敏锐的直觉可能会引导一个对上述规则的指导持完全蔑视态度的人发现解决问题的途径。在形成假设和从这种假设出发进行推理以便验证这些假设时，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要依靠逻辑规则，我们可以设计前提，由形式逻辑学家为我们做出某些特殊发现；但要注意，逻辑不是想象，而设计前提则必然是一种想象的工作。

马尔库塞的那种辩证逻辑（而非形式逻辑

辑)的概念,致力于反对象我所做的那样确立形式和内容、发现与形式化之间的区别。然而如果不以马尔库塞加以否认的那种逻辑为基础,他甚至不能形成这样一种辩证逻辑的概念,理由我已在前面给出了。而且,使逻辑成为一种既有形式又有内容的东西,恰恰是危及了逻辑的非意识形态的特征。马尔库塞相信形式逻辑是“给予现实”或“既定现实”的逻辑,而辩证逻辑是反对既定现实的。但是,正因为要完全断定任何事物或提出任何论证,就是涉及形式逻辑家制定的使论点明确的规则,逻辑是中性的。它仅仅是关于有效论证的规则,正是逻辑的中性特征使我们能够利用它批评论证的既定格式并超出这些格式。逻辑当然不会保证任何人不会将一些错误的前提用于自己的论证;但也只有逻辑会向他表明,在采用这些错误前提时他犯了什么错误。马尔库塞对逻辑这方面的忽视,部分地是由于他没有区别理智探究的两部分、社会制度使一部分理智活动受意识形态的腐化较多,而另一部分受腐化则较少。如果他想要进行这种区分的话,他可能会注意到那种对逻辑的蔑视态度必然是非理性主义的。由于马尔库塞既要与现代社会的非理性主义割断联系,又想要发现这种非理性主义的

本源，他不能理解逻辑在知识问题中的作用恰恰表明：他的整个研究将会失败。

马尔库塞对“语言哲学”的批评并非没有受到他对逻辑的理解中的错误的影响。由于他把维特根斯坦、赖尔和奥斯汀实际上差异极大的观点凑合在一起，使他自己的工作不必要地变得困难起来了（当然，也可以认为变得更容易）。上述这两个特点的后果之一是：他没有注意到维特根斯坦已经十分清晰地阐述过了他所关切的，或许是构成了他所为之焦虑的逻辑问题的底蕴的那些问题。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所关心的全部事情就是要表明语言的结构与计算的结构极为不同。计算可以是一致的或不一致的，完全的或不完全的；一种语言就不能这样。是我们而不是语言，不时地前后矛盾。因此，语言规则和遵循语言规则的东西是与计算规则和遵循计算的东西完全不同的。维特根斯坦试图构造种种语言游戏时，参与者在游戏中持有的无非是语言材料，但用以传达和谈论他所做所为的方法却与我们交流的方法大不相同，他还想象了与我们迥然有别的其他种族的语言实践，这一切都是为了发现我们语言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其他方式和支配这些方式的规则，也为了发现此种语言实践

中不可能存在的方式。这就是我们对在语言的关键表述中具有的意义和人类生活基本形式之间关系的揭示。那些不能理解这些关系的人也许是因为受到了导致人们产生神秘化和晦涩难解的表达方式的理论控制才使得他们这样做的。维特根斯坦在《蓝皮书》中攻击的一种这样的理论，正是产生于“语言是一种用于精确计算的符号系统”的观点。然而，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对语言和计算之间的区别的考察来对他们进行比较，这种比较事实上有助于我们发现上述理论的错误。这是形式逻辑的一种主要的哲学上的用途。

这点足以清楚地说明为什么马尔库塞对维特根斯坦极重视普通语言加以攻击是错误的。维特根斯坦从未否认我们需要引进技术术语，他也不曾否认这不仅在哲学中是必要的，而且在其他研究中也是必要的。但他所关心的是这样的术语不应导致模糊。马尔库塞再次将这种关心看作是当代哲学中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成份，事实上这种关心对所有的意识形态的批评都是必要的。我们从普通语言开始，因为那是我们大家都讲的语言，没有它我们就不能交往。但维特根斯坦对普通语言的兴趣是一种把真正必不可少的语言特征、因而也是社会生活的特

征与那些由歪曲的理论强加于我们的语言特征区分开来的兴趣。马尔库塞谴责维特根斯坦完全接受现状,因为他坚持认为“哲学决不应该干预语言的实际使用;它终究只能描述语言”。^①但维特根斯坦所主张的是:当哲学家们向我们说出这样一些惊人的观点时,如“我们不能确信任何事物”或“我们永远不知道别人正在感知什么”,或“我们不能知觉物质客体,”他们不能发明出一些关于语言的使用方法,而使他们免除“语言的实际使用”所必不可少的可理解性要求。必须确切地描述此种语言的实际的使用,以便理解正是由于逃避了可理解性的要求,神秘化的理论才部分地变得神秘化了。这一点与下列断言决无矛盾,维特根斯坦曾断言:“为了特殊目的改革普通语言;为了防止在语言实践中的误解而完善我们的术语,这是完全可能的。”^②维特根斯坦不相信:哲学是被用来作为改变语言的一种工具;哲学的任务是澄清概念。马尔库塞对哲学的批判显然再次表明:他所依据的是他的青年黑格尔派对哲学的夸大的要求。马尔库塞试图对特殊的社会制

① L·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1953年纽约版,第124节。

② L·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32节。

度作出特殊的批判，并试图理解改变全部社会内容的哲学这项工作，但由于这种过分夸张的对哲学的要求，他没有取得哲学应该能取得的成就。在这个问题上，他对维特根斯坦的理解和阐述也是错误的。

马尔库塞把全部知识探究都归于哲学——“理解（个人）生活的世界”——因而混淆了各不相同的研究方法和用途之间的重要区别，攻击哲学分析本质上是治疗的概念。维特根斯坦的确不时地使用这种治疗的比喻说法。但是他认为，与其说哲学是治疗性的，还不如说是把我们从错误理论中解放出来。维特根斯坦最重要的思想是：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动”每个人的哲学分析任务不能由其他人来代他完成。类似于将心理分析视为治疗方法，而将哲学分析也视为治疗方法观点，是由约翰·威斯顿姆而不是维特根斯坦提出来的。因此，把这作为维特根斯坦哲学实践的特征是错误的。因为要了解语言和社会生活究竟是什么，因而相应地了解偶然性和可变性究竟是什么，并不是象治疗法那样能一劳永逸地完成的事。

如果马尔库塞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论述大部分是误解了他著作的原意的话，那么他对奥斯

汀的批评也同样如此。奥斯汀坚持我们必须注意体现在普通语言种种特性中的共同语系，而这就是坚持保护自己免受虚假和过于简单化的理论的危害。所以在他的论文《恳求原谅》(A Plea for Excuses)中，奥斯汀比较了诸如“故意地”、“不自觉地”、“无意地”、“偶然地”等语词的特性的多样性，这类词使我们能获得一种简单的二分法，哲学家们在写作关于责任问题时常常过于依靠这种二分法。马尔库塞问道：“什么是‘共同的语言’？它是否在任何意义上包括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本质’、黑格尔的‘精神’、马克思的‘具体概念’等概念呢？”但关键是“理念”“本质”“精神”和“具体概念”体现着一些理论，这些理论承担着理性批判的工作。为了批评这些理论，我们必须发现一个立足点，作为最低限度的理论上的约定；这种对体现于普通语言中的种种差异的研究，即便如奥斯汀所强调的那样，有助于提供一个出发点，但也决不是某种可以支配我们最后结论的东西。奥斯汀在这一研究中紧紧跟随亚里士多德，他对责任的讨论显然是来源于《尼哥马可伦理学》的。因此，马尔库塞试图在奥斯汀著作和古典哲学之间揭示一种根本的对立是错误的。

马尔库塞竭力强调，哲学如果陷入抽象地讨论语句的意义，而不是具体地讨论由讲话者在特殊场合讲述这些句子时所赋予句子的意义是危险的，他确信他的此番言论是针对诸如奥斯汀的著作的。事实上，我们应该把理解句子含意和言语行为（Speech-acts）的意义之间的关系的第一次系统尝试归于奥斯汀。言语类型的系统分类是理解句子意义会怎样与其在社会情境中的运用相联系的先决条件。恰恰是马尔库塞大受其惠应该感激的那些作者，又受到了他的攻击。

马尔库塞对目前的逻辑和语言的偏见的攻击还伴随着他对当代科学哲学的实证态度的攻击。马尔库塞认为现代科学不仅在经验上而且在概念上也与现代技术相关联。“现代科学的原则是这样先验地构造的：这些原则能够成为生产管理、自我推进的世界的概念工具；理论上的操作主义与实践上的操作主义是相一致的。”这段话再一次清楚地表明：当马尔库塞攻击科学哲学中的操作主义时——结果是他把实证主义和操作主义相等同——他并不因为操作主义向我们提供了关于科学的不可信的解释而攻击它。现代科学整个课题在马尔库塞看来，实质上与统治的形式有关。马尔库塞强调他的观点

并不反对区分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纯粹科学要适应于技术的发展的，因为在需要将纯粹科学见诸特殊应用的任何方面，它都是中性的，因为它具有工具的形式。这方面马尔库塞是否正确？如果是正确的话，他把这件事与操作主义相连也是正确的吗？

操作主义是由P·W·布里奇曼系统地阐述的一种科学哲学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我们要以我们所进行的操作来理解科学的表述，这些操作是对包含于科学表述中的命题的检验。布里奇曼写道：“一般说来，我们所说的概念不过是一组操作；概念是与一组相应的操作同义的。”^①这个观点是单独阐述的，但却与维也纳学派成员所阐述的证实原则紧密相连，根据这个原则：命题的意义就是它的证实方法。对操作主义和证实主义的种种反驳业已推出，这些批驳比马尔库塞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但马尔库塞却忽视了这些反驳，这可能是他自认为对实证主义的根本反对，也能运用于任何科学哲学，尤其当这种反驳牵涉到意义哲学的时候。

这方面的理由是：马尔库塞希望坚持哲学

① P·W·布里奇曼：《现代物理学逻辑》，1927年纽约版，第5页。

中的关键术语的意义——这些也是他自己论点中的关键术语——要这样来理解：必须赋予它们比经验性的指涉更多的意义；这并不是说科学的理论概念具有比经验指涉更多的内容。谈到诸如“美”、“自由”，“白”等一般概念时，马尔库塞断言“真实的一般概念趋向于超越所有特殊经验的性质，但它仍然持存于思想中，不是仅作为想象的虚构物，也不只作为逻辑的可能性，而是作为构成我们的世界的‘质料’”。这是在复活一直存在着的马尔库塞式的理论，这个学说在30年代的论文中曾作为关于本质的理论出现过。马尔库塞正确地在当代的意义哲学中看到了对他这个学说的威胁。因为，要说服我们相信那些如我刚才引的句子并不是不可救药地混乱的，他就必须对所谓的关键术语的意思作一番解释。这些关键术语将会解释什么是一般概念。因而，一个表述的意义，如“美”的意义也可以存在于“头脑中”，并且仍然可以做为构成“我们世界的质料”。马尔库塞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混淆了语言的问题与思维问题，又把这两个问题与本体论问题相混淆了。但在马尔库塞的著作中，似乎并没有意义的理论，使得他关于人、美和自由的大量论点或许得到解释。

结果是：马尔库塞的观点仍然是飘浮不定，暗示的而不是可充分理解的，甚至不可能确切地说出它所暗示的内容。其结果就是咒语式的和反理性的，是一种对语言的魔术般的而不是哲学的使用。我已经提到了马尔库塞对发达社会发生在语言上的病症的诊断，他却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一种：即嗜好在夸夸其谈中出售自命不凡的灵丹妙药，这导致激动兴奋而不是思维，对这种语言的腐败，马尔库塞的理论负有主要责任。

第八章 马尔库塞的 革命纲领

在《单向度的人》的结尾处，马尔库塞看到了革命的反抗的唯一的的机会，而且“仅仅是一种机会而已”。这种机会是以“流浪者和被社会抛弃的局外人，其他民族和其他肤色的被剥削和受迫害者，失业者和没有被雇佣能力的人为基础的”，他们可能会采取激进的行动。这可能会导致“人类最先进的思想意识和它的最受剥削的力量”的结合。但社会批评理论却没有给予我们以任何根据来预期这种革命的发生；确实，不能预言革命正是社会批判理论的本质。因此，在1964年马尔库塞也未作出这种预言。

1969年，在《论解放的论文》中（马尔库塞称此书进一步发展了《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中的思想），马尔库塞的整个观点

都改变了。乌托邦实际上即将到来，它的可能性就存在于发达社会的技术之中。那么，是什么阻止它成为现实呢？恰恰不是政治组织上的形式问题。社会的理性重建和工人阶级真正的集体控制的建立将不会取消统治。我们不能把“按需所取”作为政治准则，因为阻碍乌托邦实现的正是人们当前所占有的需求。如果人们想要真正获得解放的话，这些需求必须经历一个“质的变化”。马尔库塞现在热情地希望为他的理论提供一个生物学的基础。他的生物学事实上就象他的形而上学一样思辨，马尔库塞明确地否认他的思辨有任何科学基础。这并不导致他在下断言的方式方面更少一点教条主义。“一旦一种特殊的道德作为社会行为准则建立起来，它就不仅是内化的（introjected）——它也将作为‘有机体的’行为准则起作用；有机体对刺激根据内化的道德，接受或反应某种刺激，无视或抵制别种刺激，这种道德促进或阻碍了有机体作为一个活的细胞在各自的社会中发挥功能。

这个观点被用作一种政治学说的基础，在此种政治学说中，《单向度的人》中所隐含的杰出人物统治论得到了明确地阐述。人性是无限可塑的，那些住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之属

性已被塑型到这样的程度：他们的欲望、需求、愿望都已达到了高度的一致——除极少数人例外，其中当然也包括马尔库塞本人。多数人不能表达他们的真正需求，因为他们不能觉察或感受到这些需求；少数人因此必须表达出多数人的真正需求，这部分积极的少数人必须拯救那些必然是被动的多数人。这些被动的多数人包括工人阶级，甚至包括新的、技术熟练的工人阶级。“这个新工人阶级”依赖于它的社会地位，能够分解、重新组织、并且改变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然而，他们既没有利益的需要，也没有生死悠关的需求迫使他们这样做：他们完全被现存的制度所整合并且待遇良好”。^①那么，谁是将要通过改造方法来拯救多数人的少数佼佼者呢？

马尔库塞关于革命力量的集合的观点，在时髦的激进派圈子里是令人十分熟悉的，我们必须特别小心，不要忽视了这种力量的极其混杂的特点：美国的学生运动、美国的城市贫民窟中的黑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越南的民族解放阵线、古巴等等。这种集合中有三种成份：第一种是真正有抱负的美国穷人和越南及别处的农民，决不能把他们和统治他们的自封

① 《论解放的论文》，1969年波士顿版，第15页

的代言人相混同；第二种是美国的SDS^①组织中的中产阶级白人以及他们在英国、德国和法国的伙伴，他们把造反和列宁例举的作为左派共产主义幼稚病的无政府主义相结合；第三种是中国、古巴、越南等共产主义官僚政治的代表，它们代表了右翼共产主义，一种寡头政治病。这些力量只有一样东西是共同的：它们是与发达的工业社会的政府相对立的。但正如马克思和列宁所认为的那样：与现存制度作斗争的并不必然是解放运动的一种力量。

马尔库塞把他关于解放力量的论述集中于关于学生造反运动特点的论点上。使他把学生造反运动看作解放运动的权威代表的首先是学生们的审美特点和他们的风格。青春勃发的力量，嬉皮士的亚文化的即黑人文化的语言，四字词的使用，这些在马尔库塞看来表现了一种与市场文化相决裂的新的感受性。被传统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与流氓无产阶级相近的小资产阶级浪漫艺术家，已成为在马尔库塞的最新的理论姿态中的促进社会变化的潜在的催化剂。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狂放不羁的艺术家的敏感实际上割断了自己与广大民众的联系；在经济

①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 for Democracy Society)。——译注

上，艺术家们是寄生于广大民众的。被马尔库塞理想化的学生当然也是如此，他们在进行第一个由父母出资补贴的造反运动时，看起来似乎更象一个新版的儿童十字军东征，而不是一次革命运动。马尔库塞所重视的正是此种小资产阶级艺术家气质的孤立性的价值，与大多数人交往并联合行动的问题并没有被他提出，因为多数人只是仁慈的革命将要关心的对象，而不是具有他们自己的声音的主体。

在他的《压抑性的宽容》一文中，马尔库塞争论说：发达工业社会民主的宽容是一种欺骗。少数人的观点之所以被允许表达是因为这种观点不会起作用；少数人所能具有的仅有的表达方式只能是一种无效的方式。他全部论点的主要前提还是：多数人和社会系统有效地控制并被塑造；使他们不能听或不能理解激进的批评。结果，人们没有自己的声音。并且，也不是在真正的民主制和精英人物统治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在互相竞争的精英人物之间作出选择，即在现在压迫的精英人物和在马尔库塞式的未来中的解放的精英人物之间作出选择。言论自由并非一件无与伦比的好事，因为在当今社会中允许言论自由就是支持错误的宣传，况且，“宽容的目的是真理”。真理是为少数的革命

者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代言人所拥有的，例如马尔库塞这样的人；多数人必须由少数人进行再教育以明了真理才能获得解放，这少数人被授权制止对立和有害的意见。这个观点可能是马尔库塞所有理论中最危险的观点，因为不仅他断言的东西是不可靠的，而且，如果他们这个观点被广泛接受的话，将形成对理性进步和解放的最有害的障碍。

马尔库塞理论最奇特的地方是他从自由主义和欧洲革命传统的右翼批评家那里接受了他们错误地归之于左翼的一种理论，但在马尔库塞拥护这种理论以前，这种理论却极少为人所接受、雅各宾和列宁都信奉对少数反革命实行暂时的专政的理论——无论他们是否有实际行动。但这却为马尔库塞宣称信仰少数人的专政留下了根据。

那么，容忍、理性和解放之间的真实联结是什么呢？容忍的目的不是真理而是合理性。我们当然重视理性，因为凭借合理的方法，我们才能发现真理；但一个具有许多错误信念的人也可能是有理性的，而一个具有真实可靠的信仰的人也可能是不合理性的。关键是前者具有走向真理的可能性；而后者则不仅没有什么证据肯定他所相信的东西，即便这种信念是真

的，而且还容易继续获得错误的信念。什么是合乎理性？理性的必要条件是：一个人应该用这样一种方法系统地阐述他的信念：即他应该清楚反对他的信念的论据是什么，他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以任何可能的极端观点为根据的批评与反驳。反之，取消宽容恰恰是断绝这样的批评和驳斥，一个人不承认自己容易犯错误，将会极大地危害他的理性。

当前最急迫的任务之一，是要坚持使社会和政治制度接受持续的理性批判，并保持大学中和其他地方的理性探究的自由权、理性的制度化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伟大成就之一，当然，正是制度化这个事实可以被用来孤立理性批评的实践和阻碍理性运用于社会制度中；而且，也存在着要大学和其他机构把理性探究的实践变成仅为政府目的服务工具的持续压力。这些为了现存制度的利益而对理性研究进行的冲击必须受到抵制。一个新的反对宽容的马尔库塞的激进形象的出现，使得信奉马尔库塞理论的激进分子恰恰与他们所攻击的社会力量结成联盟，这不仅是他们的理论问题，也是他们的实践问题。在马尔库塞派的学生联盟看来，大学对自由进行教学和研究的权力的捍卫，马上变得比什么都危险，虽然马尔库塞有时对大学亦

不加批评。

我的观点是：宽容和理性的内在联系的观点不仅仅是一个先验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从理性地把握理论到非理性地把握理论的转变，是马克思主义者断绝对自身可能的批评和反驳的结果。在苏联，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真正的信仰用国家权力来加以捍卫的做法，致使马克思主义萎缩并产生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不合理性。国家权力的这种使用不仅压抑了容忍，并且是少数人对付多数人的手段，这种手段非常类似于马尔库塞告诫他们的那些少数精英人物对待多数人的态度。在苏联，多数人在其自身解放的利益中是再教育的被动的客体。马尔库塞请求我们重复的是斯大林主义实践的一部分。

一个人不能自上而下地解放人民，也不能在这个基本层次上对人民进行再教育，正象青年马克思所看到的那样：人们必须自己解放自己。而赢得解放的唯一的教育自我教育。把人们当作其他人的解放的对象，就是把他们当作被动的工具；也就是把他们当作呆滞的质料投入到由精英人物选择的形式中加以塑造。发达工业社会的多数人经常是困惑的、不快乐的、并意识到他们的无权地位；但他们也经常感到有希望、富有批判性，并且能够掌握直接的幸

福和自由的可能性。马尔库塞过低估价了多数人的存在。他的理论导致他对多数人的错误的蔑视，并支持了那些事实上恰恰产生了他所谴责的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屈从状态的非理性主义。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片断、弗洛伊德心理玄学被修改后的主干——从所有这些材料中，形成了马尔库塞的理论；就象他的许多先驱者一样，这种理论祈求自由和理性的伟大名义，却在每个重要的观点上都背叛了自由和理性的本质。

书目提要

这里列出的仅是马尔库塞的主要著作。完整的书目可参见由巴林顿·莫尔,杰尔(Barrington Moore, Jr)和库特·沃尔夫(Kurt Wolff)主编的《批判的精神:纪念赫伯特·马尔库塞论文集》(波士顿:烽火出版社,1967版)[Boston: Beacon Press, 1967.]

《纯粹容忍批判》(与R.P.沃尔夫和巴林顿·莫尔,杰尔合著)波士顿:烽火出版社,1967版, [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 (with R.P. Wolff and Barrington Moore, Jr) Boston: Beacon Press, 1967.]

《爱欲与文明》波士顿:烽火出版社,1955版。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5.]

《论解放的论文》波士顿:烽火出版社,1969版。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否定》波士顿：烽火出版社，1968版。〔Negations.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此书虽然最近才出版，书中却收录着自30年代以来马尔库塞的许多重要论文。

《单向度的人》波士顿：烽火出版社，1964版。〔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理性和革命》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1版；〔Reason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1955年由纽约人文出版社再版发行时，此书又补充了新材料。本书中的引文是从波士顿烽火出版社1960年发行的平装本中摘录的。

《苏联马克思主义》.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8版。〔Soviet Marx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译后记

本书作者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 现任美国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 大学哲学系教授。他曾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习, 1951年获硕士学位; 1961年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 1983年获斯沃斯莫尔(Swarthmore) 学院名誉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曾先后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里兹大学哲学讲师、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布兰迪斯大学思想史教授。1969年他到美国后, 同年任波士顿大学文学院院长, 后又任该校哲学和政治学教授至今; 同时兼任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麦金太尔兴趣广泛, 在人文科学的多个领域颇有建树, 除本书外, 他的主要著作还有: 《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1953年); 《无意识》(1957年); 《伦理学简

史》（1966年）等。他同时还是一位哲学杂志和文集的编辑，并兼任多个大学的研究员。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很多同志的帮助和支持。在我译出初稿后，首先由我的学友于海在繁忙的学习中抽出时间校译了全部译稿，同时黄勇同志也对部分译文进行了校订，后来又由丛书编委张晓明同志再度校审了全稿，编委刘继也对译文进行了认真审阅。应该说明，没有上述同志的共同努力，译稿将不会有现在的面目。在此谨致由衷的谢意。

译者

史》（1966年）等。他同时还是一位哲学杂志和文集的编辑，并兼任多个大学的研究员。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很多同志的帮助和支持。在我译出初稿后，首先由我的学友于海在繁忙的学习中抽出时间校译了全部译稿，同时黄勇同志也对部分译文进行了校订，后来又由丛书编委张晓明同志再度校审了全稿，编委刘继也对译文进行了认真审阅。应该说明，没有上述同志的共同努力，译稿将不会有现在的面目。在此谨致由衷的谢意。

译者